

問題與研究

第四卷 第十一期

本期要目

- 漢城會議與亞洲現代化問題……………雷崧生
世界金融合作之現況……………林霖
日本參議院選舉後之政局動向……………朱少先
日本與越南戰局……………張棟材
現階段共匪之統戰政策……………張敬文
李柏曼建議與蘇俄計劃工作改制……………呂律
俄共組織現況分析……………關素質
捷克經濟計劃制度「修正」的理論與實際……………尹慶耀
一九六四年亞洲國家經濟的發展……………馮世範
現代化與毛澤東的幻想……………楊允瑛譯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
八月十日出版

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

目 次

漢城會議與亞洲現代化問題·····	雷崧生·····(1)
世界金融合作之現況·····	林 霖·····(4)
日本參議院選舉後之政局動向·····	朱 少 先·····(6)
日本與越南戰局·····	張 棟 材·····(11)
現階段共匪之統戰政策·····	張 敬 文·····(14)
李柏曼建議與蘇俄計劃工作改制·····	呂 律·····(20)
俄共組織現況分析·····	關 素 質·····(28)
捷克經濟計劃制度「修正」的理論與實際·····	尹 慶 耀·····(34)
一九六四年亞洲國家經濟的發展·····	馮 世 範·····(41)
現代化與毛澤東的幻想·····	楊 允 瑛 譯·····(46)
匪區農業的兩項絕症·····	沈 學 經 譯·····(51)
蘇俄動態述評·····	一 心·····(57)
①俄共青年團七中全會。 ②重要經建二事。 ③俄南加強勾結。 ④伊朗國王應邀訪俄。 ⑤外國留俄學生今年畢業人數。	
每月大事記(國際·敵情)·····	(59)
編後紀·····	編 者·····

漢城會議與亞洲近代化問題

雷 崧 生

壹

本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三日，韓國高麗大學校亞細亞問題研究所 Asiatic Research Center，召開「亞細亞近代化問題國際學術大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roblems of Modernization in Asia（簡稱近代化會議 Modernization Conference）於漢城郊外的華克山莊 Walker Hill Resort，以慶祝該校的六十週年紀念。參加者有韓、中、美、日、菲、英、西德、與印度等國的教授、專家、或學者，共六十六人。作者以臺灣大學的推薦，被邀出席。另有韓、美、日、與英等國籍的觀察員十餘人。

大會主席由亞細亞問題研究所所長李相殷担任，而全體會議則由印度籍的澳洲末爾本大學印度學系主任萊伊 Shrinayan Ray 担任主席。到會教授等分屬五組；每組十一人至十六人不等。五組的主題如下：

- 第一組：近代化的概念問題。
 - 第二組：亞洲傳統社會與近代化。
 - 第三組：近代化與政治問題。
 - 第四組：近代化與經濟問題。
 - 第五組：各社會階層在近代化中的任務。
- 論文的宣讀與討論，大都在分組會議中進行，或亦採用五組聯席會議的方式。宣讀與討論，為時各四十分鐘。提出論文共六十二篇，涉及哲學、歷史、政治學、國際法、國際政治、經濟學、與社會學等方面，將由亞細亞問題研究所彙集印行。

貳

作者參加第三組的討論。其他參加第三組者，有漢城大學國際政治教授李用熙、延世大學比較法學教授成秉春、美國加利弗尼亞大學政治學系主任史卡拉比洛 Robert A. Scalapino、印蒂安拉大學政治制度教授黎格斯 Fred W. Riggs、勃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裴極 Glenn D. Paige、日本東京大學退休國際法教授植田捷雄、德國格丁根大學政治學教授賽德魯 Bruno Seidel、馬堡大學政治學教授赫爾發特 Heinrich Herrhardt 等。全組共十六人，為五組之

漢城會議與亞洲近代化問題

人數最多者。會場亦較其他各組為大，旁聽者經常有二十餘人。

第三組的討論，頗為廣泛而深入。發言人的原文，均錄音保存，現正由亞細亞問題研究所予以整理，將附在論文後發表。茲根據作者個人的筆記，將該組關於「何謂亞洲近代化」的討論，作一簡要的報告，以見一斑。

何謂近代化？何謂亞洲近代化？這些原是第一組所應當討論的問題。第一組與其他各組，或曾討論這些問題，由於作者的未嘗參加，無法獲悉。但是，第三組在討論「近代化與政治問題」以前，即先討論「何謂近代化」與「何謂亞洲近代化」。

這裏所謂亞洲，在討論時，自非指整個的亞洲而言。譬如日本與印度，同在亞洲，却不宜相提並論。日本以明治維新而近代化，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八個強國之一。相反地，印度的近代化，却是其淪為殖民地的後果。它們遭遇到極不相同的國運。因此，這裏所謂亞洲，應當是指東亞而言，特別是中、韓、與日本等國。

近代化一詞雖然早經成為日常用語，但是，其內涵實甚含混。歸納言之，它可取得幾種意義如下：

一、近代化是歷史上的一個過程

近代化的意義，是近代史上的演進。就東亞而言，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當中、韓、與日本等國，決心放棄其傳統的閉關政策，而與歐美諸國交往時，它們便加入了近代的國際社會，採納了西方的國際法體系。從那時候起，中、韓、與日本等國，即已開始其近代

化的過程。

二、近代化是「西化」 Westernization

近代化的意義，是西方文化的吸收與接受。東亞諸國均曾一度拒絕並抵制西方文化；後來復有所謂「全盘西化」與「部分西化」的論爭。

三、近代化是「工業化」 Industrialization

近代化的意義，是農業資本的演進為工業資本，或農業社會的演進為工業社會。工業化云云，不啻是「部分西化」的修正論，也頗似我國清季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舊觀念。

四、近代化是「民主化」 Democratization 與「科學化」 Scientification

近代化的意義，一方面是在政治上、經濟上、與社會上，使基於個人尊嚴的自由與平等兩大原則，獲得普遍的實施；另一方面是使減輕人類勞苦的科學方法與加強工作效率的管理技術，獲得一般的應用。前者稱為「民主化」，亦稱為「政治的近代化」。良以自由平等兩大原則的普遍實施，即是在經濟與社會方面，也必須借助於政治手段的採用。後者稱為「科學化」，亦稱為「技術的近代化」。它與「工業化」，詞雖異而義實同。美國教授們頗主張運用「工業化」字樣，而擯棄「科學化」一語。他們認為「Scientification」與其動詞「Scientify」或「Scientitize」，均不推馴，極難為美國學者所採納。

五、近代化是對於較高文化的適應與競賽

近代化的意義，是一種文化接觸到較高的他種文化時，所發生的一連串反響，包括排斥、容忍、採納、與創制等等。其結果往往比較低的文化與較高的文化「看齊」，甚至於產生一種新文化。這原來的較低文化，便完成了它的近代化的過程。舉例言之，當古代的韓國文化接觸到古代的中國文化時，前者對於後者發生一些適應與競賽的反響。這可以視為是古代韓國文化的近代化。又如十九世紀的中國文化，接觸到十九世紀的西方文化時，前者對於後者的反響亦同。這無疑地是中國文化的近代化。

這種見解具有二個特點如下：

甲、它所謂近代化，不必即發生於近代史中。它所謂近代化，是迎頭趕上同時期裏的較高文化，可以說是「與時代看齊」。

乙、它所謂近代化，不是較低文化的片面接受較高文化，而是較低文化與較高文化的競賽；而前者可能超越後者，而創造一種新文化。

以上五說，優劣互見。第五種見解應當是關於近代化的最新學說。猶如其他學術會議一樣，第三組的討論，並不能夠獲致全體公認的結論。

參

在會議期間，作者在第三組的分組會議裏，聆聽了十二篇論文的宣讀；在五組聯席會議裏，聆聽了四篇。這些自然都是宣讀者的精心結構之作。其中作者最欣賞的，當推成均館大學政治學教授車基璧的「近代化與政治領導問題」與漢城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孫製錫的「韓國政治中的軍人」。

作者在第三組所宣讀的論文，是「西方國際法體系之傳入中國」。茲摘譯大意如次：

西方國際法體系的傳入中國，在十九世紀六〇年代的初期，距今約百餘年。第一本中文國際法書籍，是美國國際法學家菲頓 Henry Wheaton 國際法概論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的譯本，於一八六四年出版。這本書與其姊妹篇的相繼問世，實加速了中國的近代化。這個一世紀前的史實，為許多人所忽略，殊有追述的價值。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雖然已經和一些歐美國家，締結了條約的關係，但是，政府官員與學者們，對於西方的國際法體系，還很茫然。據說林則徐曾委託美國籍的伯駕 Peter Parker 醫生，逐譯瑞士國際法學家瓦德魯 Emerich de Vattel 國際法 Le Droit des Gens 書中的戰爭、封鎖、與扣船等等部分。這個節譯本也許傳布得不太廣；對於中國的士大夫階級，似無任何重大的影響。有系統地介紹西方國際法，實以美國籍的馬丁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 傳教士為其嚆矢。

一八六二年，同文館設立於北京。馬丁被聘為該館的國際法教

授。從此以後，他便以「丁建良」的中文姓名，與中國朝野相周旋。他在同文館所講授的國際法，應當是中國學校裏的第一個國際法課程。他也許看見過伯駕的瓦德魯節譯本。他會有意將瓦德魯的國際法，全部譯出，從事於有系統的介紹。但是，當時美國駐華公使華德 John E. Ward，却勸他逐譯菲頓的國際法概論。他採納了這個建議，夜以繼日地工作着。他的譯稿於一八六三年完成；經由另一位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 的推薦，送請中國的總理衙門撥款出版。

美國朋友們認為中國有了解西方國際法的必要，是值得銘感的。但是，他們這種不自私的態度，却遠非其他西方人士所一致贊許。譬如當時法國駐華代辦哥士者 Kleckowsky，即表示反對。他毫無含蓄地指出：中國的外交人員一旦諳熟了國際法以後，將成磋商時不易應付的對手。

總理衙門收到了丁建良的譯稿以後，並未作任何處理。其中所討論的題材，對於大臣們頗為陌生，使他們躊躇不決。很幸運地，中國與普魯士之間，恰巧發生了一個不大不小的事件，有利地決定了這部譯稿的命運。那時候，普魯士正在向丹麥作戰。當普魯士駐華公使李福斯 Von Rehfuss 乘坐軍艦，來到大沽口外，而發現三艘丹麥船時，他立即下令予以拘捕。總理衙門爲着維持中國的中立權利，即從丁建良的譯稿裏，找得了駁服李福斯的法律理由。李福斯竟不得不讓步，而放棄了其原來的強硬立場。

這樣，總理衙門才決定印行丁建良的譯稿。它特派陳欽、李常華、方濬師、與毛鴻圖等四人，先予以校閱；接着撥銀五百兩，作爲付梓的費用。於是，丁建良的譯稿，以「萬國公法」的書名，始與世人相見。這本書不僅由總理衙門分發各省督撫與各港口當局，以供參考，抑且爲有志於「洋務」的知識分子所諷誦。它旋即流傳入日本與韓國，亦爲彼邦政府官員與學者們所能讀到的初期國際法書籍之一。

除開萬國公法而外，丁建良在中國學者的合作之下，還逐譯了四種書籍如下：

一、星報指掌 一八七六年出版。原書爲馬登斯 Charles de Martens 的外交指南 Le Guide diplomatique。

二、公法便覽 一八七七年出版。原書爲烏魯齊 Theodore D.

漢城會議與亞洲近代化問題

Woolsey 的國際法研究導論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

三、公法會通 一八八〇年出版。原書爲布倫希利 Johann K. Bluntschli 的國際法總纂 Le Droit international codifié。

四、陸地戰例新選 一八八三年出版。原書爲國際法學會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的陸戰法律教本 Manual of the Laws of War on Land。

丁建良一方面將西方的國際法體系，介紹入中國，另一方面也想將中國春秋時期的公法，闡明給西方的學者們知道。他很快就開始研究中國的古籍；對於春秋時期周室與諸侯的關係和諸侯之間的相互關係，有深遂的認識。一八八一年九月，他在柏林的東方學會會議裏，提出其法文論文，題爲「中國古代國際法之遺跡」。一八八四年，汪鳳藻譯爲中文，稱爲「中國古世公法」，收入西政叢書裏。

丁建良以西方國際法的觀點，來研究春秋時期的公法，提供了中國人自己創作國際法書籍的靈感。一九〇一年，藍光策的春秋公法比義發微，是中國人所寫的第一部國際法專著。他將春秋時期的公法與西方的國際法體系，作一比較的研究。一九〇五年，呂海寰的奉使金鑑出版。這是一部關於國際法與國際實例的著作。

現在，研究國際法的人們，在百年以後，來回溯中國近代化的過程，而對於丁建良與其中國同僚在國際法園地裏的拓荒工作，表示其敬意與謝忱，實在是非常適當的。

肆

這次亞細亞問題研究所主辦的近代化會議，無疑地是一個成功的會議。無論從被邀請的人選、會議的內部組織、論文的學術水準、宣讀與討論的熱烈情緒，以及到會者飲食起居與接待的安排等等方面看來，該所應當值得無保留的贊美。兩年的籌備工作，是絕非虛擲的。更重要的是：如果該所本身不是已經具有了相當的學術地位，而又與他國學人、學術團體、或基金會等，經常維持着密切的聯繫與合作，獲得了其重視與支持，這次會議殆無召開的可能。

韓國高麗大學校的六十週年紀念，曾舉行過許多慶祝的節目；而近代化會議的順利召開與圓滿結束，應當是最有意義也最有影響的紀念方式。

世界金融合作之現況

五大金融俱樂部概述

林霖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自由民主國家的金融當局，為解決重要世界金融問題，透過五個重要金融組織，分別集會討論，密切合作，成效卓著。

這五個組織中，最主要的當然是國際貨幣基金會，其次為巴黎俱樂部，其次為巴塞爾俱樂部，其次為第三工作小組，再其次就是六人俱樂部。

國際貨幣基金會

一、國際貨幣基金會(簡稱 I. M. 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這是聯合國的一個特別機構，現有會員國一百零二個，它有時被人家認為是各國中央銀行的中央銀行，但究其實，並非銀行，而是道地的金融合作機構——非共產國家的合作組織。I. M. F. 經常注意世界黃金與通貨的供給與運流，提供促進金融穩定的各種措施，作為經濟業已繁榮國家和經濟正在發展國家共同會商的場所。它握有由會員國認繳的黃金與通貨共約值一百六十億美元的雄厚資金，(今年二月該基金執行理事會議決，各國攤額普通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另十六國特別增加一部份，一俟各國同意批准，基金資金總數將由一百六十億增加至二百一十億美元。) 隨時有力量對金融危機發生的國家，給予適當的通融或貸款，通融方式有正常與特別二種，正常的辦法是由會員國提繳本國通貨以購用黃金或「外匯」——他國通貨，但每年最多不能超過其攤額的百分之二十五，五年內可共購用等於攤額的一百二十五。特別的辦法，是由會員與基金會

訂立「備提信用協定」在一定金額與一定期限內，會員國可隨時提用基金會的「外匯」，以解除或減輕其國際收支的困難。會期，每年一次，經常在九、十月之間舉行。

十國集團

二、十國集團 (The Group of Ten)，普通稱為巴黎俱樂部 (Paris Club) 這是由國際貨幣基金會中十大工業國家 (包括比利時、英國、加拿大、法國、西德、義大利、日本、荷蘭、瑞典及美國) 的中央銀行總裁及財政部部長所組成的最高小組會議。這十個大國經常為 I. M. F. 從事研究有關問題。不但如此，遇必要時，在 I. M. F. 的資金之外，以他們自己本國的「硬幣」作為貸款的補充。他們與基金會訂立一種協定，名為貸款總協定 (The General Arrangements to Borrow 簡稱 G.A.B.) 十國分別認繳一定數量的攤額，借給 I. M. F. 以供運用，這十國集團最近正為 I. M. F. 研究如何建立新型國際準備通貨問題。

巴塞爾俱樂部

三、巴塞爾俱樂部 (Basel Club) 這是一個由十二個國家的中央銀行總裁所組成的「小組」，其會員除上述十國集團中十個國家外再加上奧地利及瑞士二國。這個俱樂部實是由國際清算銀行 (Th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簡稱 B.I.S.) 所派生出來的。國際清算銀行成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經常替歐洲各國中

央銀行安排短期的信用。各國中央銀行主管每於B.I.S.開會前二天，利用週末度假的機會，舉行一連串的祕密會議，以交換貨幣問題與措施有關的情報和意見。會期，每月在國際清算銀行所在地巴塞爾舉行一次。

第三工作小組

四、第三工作小組。這是在西歐馬歇爾計劃合作之下所產生，而由廿一國組成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中具有特殊性質與莫大影響力的一個小組。其會員包括歐洲各國及美國中央銀行家和政府官員。這個小組審定各國政府的信用地位，並且與B.I.S.合作，不斷注意國際貨幣制度的活動與發展。他的決定常為貸款各國所接納，因此他具有極大的權力，會期，每月在巴黎舉行一次。

六人俱樂部

五、六人俱樂部。這是屬於歐洲共同市場六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家所組成的委員會。他們每於巴塞爾俱樂部開會之後集會，以討論共同市場的銀行政策，並於每三個月與歐洲共同市場各國財政部長會議，而成爲歐洲共同市場的貨幣委員會。

上述各種會或俱樂部出席的人選，都是各國的金融主管當局，或稱爲金融「首腦」(見附錄)。他們是非共產世界金融合作複雜制度的保母。這個合作制度是一九四四年不列頓森林會議所創始，並經過二十年的活動而逐漸成形與擴展出來的。這些「保母」多半來自西歐及美國。他們的任務，在於經營貨幣的流通與運用，審議並評定各國信用的等級，援助面臨危機的通貨並且監督債務國履行其國際支付義務。他們的工作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的經濟，得以在安定中趨於繁榮，厥功甚偉。參加這些俱樂部的金融巨子，都是能言能行的各國的幹練人材。他們能守密、守信，不重虛名，實是求是，每每往返於巴黎、巴塞爾、倫敦、華盛頓之間，或親身訪問。當面磋商，或隨時以電話電報交換情報。從前各國金融當局，各自祕密進行調查研究或計劃，彼此不相聞問；現在則經常互

通消息密切合作。各個中央銀行均設有相當龐大的國外部，負責互相聯繫。自去年十二月起，巴黎俱樂部，且共同採用一種機密統計制度，研究各國經濟金融情形，而將其所獲資料，公開給參與國家的中央銀行。他們合作的程度，日益密切。現在一個國家可能將其變更貼現率的決定於實施前幾小時即通知別一國家，這種行動在幾年前是聞所未聞的。

他們在會議時對外絕對保密，但彼此發言，坦白直率，並不受外交形式或拘謹禮節的羈束。

巴黎俱樂部最近數年，其地位與影響日形重大。他們雖在形式上無特殊權力，但事實上各國政府都得聽從他們的意見。比方說，他們會實際強制英國威爾遜政府實行緊縮措施，並迫令美國詹遜政府採取各種有效步驟，以減少多年來繼續不斷所發生的國際收支逆差。(註：一九六一年及一九六四年英鎊的危機就是靠他們的協助而獲度過的。)

在世界金融決策方面，上述由二十一國代表組成的第三工作小組，占有極重要地位。例如，最近有一個與整個自由世界金融安全有關的重要議題，就是由這個工作小組負責決定研究作成決策的。這個重要議題是什麼？就是要不要對英鎊的穩定繼續支持以免危害現行國際貨幣制度？原來，英國於去年十一月英鎊發生危機時，曾由十大工業國家給予貸款三十億。這個貸款中，業已動用的七億五千萬元，英國必需按時償還，同時在最近的將來英國仍有賴「貸款」的支持，但不願再動用上列危機貸款。因此，要求國際貨幣基金，貸予一億四千萬元，將以其中七億五千萬元償債，以所餘六億五千萬元作緊急之提用。第三工作小組在上月(五月)乃就英國國情加以詳細研究，認爲英國政府現已實施新的節約預算，而在四月一個月中，其黃金及「硬貨」準備已增加二千二百四十萬元，且工黨政府最近曾宣佈採取嚴格信用限制政策，因此種種，其信用地位顯有改進，經過二日的討論，乃決定准如所請，給予一十四億的貸款。貸款總額中，黃金應占多少，「硬貨」應占多少的問題，則交由巴黎俱樂部決定。這麼一來，英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的債務，將達到飽和點——二十四億元。是基金對會員國最大的一筆通融。

就日本整個政治情勢言，自民黨政府受此次參院選舉得失的影響不大，而目前日本所面臨的下列重大問題，將是政局發展的關鍵：①批准日韓基本條約；②如何解決經濟危機；③對越南戰局的態度；④對匪政策；⑤自民黨內部派系。

日本參議院選舉後之政局動向

朱少先

一 參議院之構成與職權

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依照「大日本帝國憲法」規定，國會由貴族院與衆議院所構成。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聯軍司令部命令廢止貴族院，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麥克阿瑟司令部交付日方之憲法草案，國會爲一院制。當時日本政府，根據過去衆議院對通過各種法案之輕率史實，爲慎重審議與相互制衡起見，要求新憲法仍採取「參議院」與「衆議院」兩院制，此事獲得了盟總的同意。不過戰後日本新憲法中之參議院，與戰前之貴族院，在構成上及權限上，性質完全不同。過去貴族院議員，實質上由皇族、貴族及勅選議員所構成，其職權與衆議院相同。而現在的參議院，議員定額二百五十名，規定由國民直接選舉，爲了使議員能具代表國民之性格，故將選舉區劃分爲全國區及地方區兩部分，其中一百名由全國區選出，另一百五十名由地方區分別選舉，此一制度，在推行之初，代表尙能做到參議員之超黨派立場，一九四七年當參院成立之初，代表知識份子之綠風會佔九十席，各保守黨派佔八十六席，革新黨派佔五十二席，其餘爲無黨派人士。但至一九五三年第三屆改選後，綠風會降至七十一席，一九五六年更一落千丈，減少至二十席，一九五九年更降至十一席，一九六二年則減至七席。到本屆選舉，幾已無形消滅，故目前參院情形，已成爲第二衆院，變爲政黨爭雄之舞台，非但無法達成「防止與平衡」作用，反增加政治上之糾紛。造

成此一情勢之原因，主要係由於各政治團體、勞工團體、宗教團體均有全國性組織，力量日漸強大，故無黨派之獨立人士，極難獲得選票所致。

參議員任期爲六年，每三年改選半數一百二十五名，自一九四七年舉行第一次選舉，至本屆係第七屆改選。此次選舉除改選本年六月一日任期屆滿之議員一百二十五名（全國區五十名，地方區七十五名）外，尙須補選缺額兩名，故本屆應選出一百二十七名。至於參議院之職權，依照憲法精神，係代表「國民理性與良知」，對衆議院發生制衡作用，故在憲法第五十九條中規定，凡一切案件，須經兩院通過後始成爲法律，以限制衆院之草率從事。不過在事實上，雖然法律案件規定必須兩院通過生效，但如參議院對案件作不同決議時，經衆院三分之二以上之多數，再予通過，仍可成爲法律。此外對於預算案、批准條約案，規定先向衆院提出，如兩院作不同之決議時，召開兩院協議會，如其意見仍不一致，或參院收到衆院決議案，於三十日內不作決議時，即自然生效。故實際上參院權力極度有限，對衆院之牽制力並不太大。

由於上述情形的發展，使參院已喪失原有之機能，實際上已成爲兩黨政爭之舞台，相當於第二衆院，因此，廢止參院及修改選舉法之呼聲，日見高漲。在目前情況下，修改憲法之可能性不大，至少在短期內，日本國會，仍將維持兩院制之體制。

二 本屆參議院選舉之結果及其特點

台，非但無法達成一...

日本參院上屆改選，係在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舉行，該次選出之議員，任期尚有三年，但前屆一即一九五九年六月二日選出議員一百二十五名，本年六月一日任期已滿。故佐藤內閣決定自六月十日起，開始候選人登記，七月四日實施第七屆參議員之半數選舉。這次改選人數，全國區者五十人，地方區者七十五人，共一百二十五人，此外尚有任期未滿缺額三人，其中二名在本次同時選舉，故實際上本屆應選出一百二十七人。各黨派改選及非改選之參議員人數如下表：

黨派別	改選前參院議員數		應改選議員數		非改選議員數	
	總數	全國區	地方區	總數	全國區	地方區
自由民主黨	144	27	117	36	108	24
社會明會黨	163	27	136	9	127	4
公民社會黨	93	2	91	2	89	2
共產黨	3	1	2	1	2	0
小黨	5	2	3	2	3	0
無黨派	4	2	2	2	2	0
缺額	7	4	3	3	4	0
總計	250	50	200	50	150	25

至於各黨得票總數及得票率之比較如下表：

黨派別	全國區得票數		本屆得票率		上屆得票率	
	得票數	得票率	得票數	得票率	得票數	得票率
自由民主黨	1,758,757	35.14%	1,463,340	29.07%	1,463,340	29.07%
社會明會黨	2,077,888	41.56%	1,734,482	34.69%	1,734,482	34.69%
公民社會黨	519,278	10.39%	496,417	9.93%	496,417	9.93%
共產黨	20,478	0.41%	13,340	0.27%	13,340	0.27%
小黨	12,207	0.24%	8,146	0.16%	8,146	0.16%
無黨派	2,609,082	52.18%	2,348,217	46.96%	2,348,217	46.96%
總計	3,720,901	74.40%	3,000,000	60.00%	3,000,000	60.00%

截至六月十三日下午五時止，各黨派候選人登記人數，共計三百三十二人，其中全國區者九十九人，地方區者二百三十三人。各黨派候選人登記人數如下表：

黨派別	候選人數		備註
	全國區	地方區	
自由民主黨	16	95	其中新人四十二人
社會明會黨	1	66	新人三十九人
公民社會黨	2	59	新人十一人
共產黨	2	9	新人十四人
小黨	3	5	新人四人
無黨派	5	9	新人三十五人
總計	33	333	

七月四日投票結果，根據日本自治省公佈，本屆選舉有公民權之總人數為五千九百五十三萬二千九百四十二人，而實際參加投票者為三千九百八十九萬五千八百五十七人（其中熊本縣二村因豪雨未能投票），投票率為六七·〇一%，較上屆六八·二二%略低。

各黨派當選席次如下表：

黨派別	當選席次		增減席次	改選後在參議總席次
	總額	全國區地方區		
自由民主黨	七六一	二二五	減少四席	一四〇席
社會明會黨	一三一	二二九	增加八席	七三〇席
民主社會黨	三三三	二二二	減少一席	二〇〇席
共產黨	三三三	一一一	增加七席	七〇〇席
無黨派	—	—	增加一席	一三四席
總計	二二七	五二	七五	二五〇席

註：各項統計表，係根據日本各大報資料所編製。我們從上述各項統計及選舉結果，可以將此次參院改選，歸納出若干特點：

(一)參議院因對政治影響力不若衆院之大，因此參院選舉，往往亦不若衆院選舉之激烈，或受人重視。但本屆選舉，情形不同。就自民黨而言，因係佐藤榮作首相出任該黨總裁後第一次全國性選舉，含有信任投票意義。社會黨佐佐木委員長，出任黨魁未久，這次選舉成敗，對佐佐木在社會黨地位有極大影響，如果選舉獲勝，今秋黨大會中，佐佐木的領導權即可鞏固。公民黨前身是創價學會，故此大為該黨正式成立後所面臨的第一次考驗。至於民主社會黨，近年來黨勢不振，極希望在次此選舉中，重振聲威。因為各政黨有上述背景，因此競選非常激烈，東京選舉區的四個席，有三十九位候選人逐鹿。

(二)從此次候選人成分加以分析，在總候選人三百三十二人中，屬於政黨者達二百三十四人，佔總候選人的七六·五%，無黨派人士僅佔二三·五%。說明參院已完全走上政黨競爭之路。再從選舉結果看，參院事實上已無法發揮對衆院的制衡作用，成爲第二衆

院，兩院制的優點已完全喪失。

(三)自由民主黨在此次選舉中，雖然減少了四席，但在全國區總得票數中的百分比，較上屆四六·四%，高了〇·六七%，相反的，社會黨雖然增加了八席，但其得票率較上屆二四·三%，低了〇·九八%。兼具政治與宗教色彩的公明黨的得票率，則較上屆一·五%，高出了二·一八%，這裏顯示自由民主黨仍在爲大多數國民所支持的政黨。但公明黨得票率的增加，值得重視。

(四)日本共產黨在此次選舉中，雖然僅改選兩名參議員，但竟推出四十八名候選人，其中全國區二名，地方區四十六名。這是日本共產黨一貫的作風，希望在地方選舉中，以多取勝。就得票率而論，較上屆三·一%，高一·三三%。並增加了一席，現在在參院二百五十席中，已有四席，雖然席次仍微不足道，但得票率的增加，尤其該黨主席野坂參三在東京區以最高票再度當選，顯示日共在都市的力量，已在逐漸增加，是一項不可忽視的現象。

(五)公明黨前身是創價學會，原是一個宗教團體，以宗教團體參加政治，在日本已屬創舉，而竟能一九五八年地方選舉中提名七十六名候選人而全部當選，一九五九年參院選舉中之六名候選人及一九六二年之九名候選人亦均全部當選，本屆推出十四名候選人，亦有十一人當選，現在在參院已有二十席之多，成爲第三大黨。在地方議會勢力，亦日有增長。其發展對未來日本政治，有極大影響，尤其該黨競選政綱中，對共匪問題，主張承認偽政權及同意共匪加入聯合國，反對日本再軍備及主張撤銷日美安保條約等，與左翼政黨主張相吻合，故其動向值得重視。

(六)在本屆候選人中，新人達二百三十七人，佔全部候選人的七四·四%，較上屆六三%，新人增加了一四·四%。而當選參議員一百二十七名中，新人共五十四名，佔四三·五三%。顯示參院亦在新陳代謝中。就年齡而言，候選人中年齡最低者爲三十歲，最高有七十八歲，一般年齡，普遍降低。其中女性議員共九人。

三 參院改選後之政局動向

本屆參院改選結果，自由民主黨減少了四席，因此東京的政治觀察家們，一致認為選舉結果，是對「佐藤內閣一項警告」，東京六日各大報社論，均作同樣批評。無可諱言，自由民主黨在此次選舉中的小挫，對該黨及佐藤內閣，自然是一項打擊，但就全般情勢而論，自民黨在參院二百五十席中，佔有一百四十席，仍屬過半數多數之第一大黨，社會黨雖已增至七十一席，但未能超過三分之一阻止修憲線。何況衆院議員席次，自民黨在四百六十七席中，佔二百八十六席之多數安定席次，（社會黨一百四十五席，民主社會黨二十三席，共產黨四席，無黨無派二席），且各野黨政治立場不同，極難組成統一陣線對抗執政黨；因此，在本屆參改選後國會兩院內政治情勢，並無多大改變。

至於此次自民黨在選舉中小挫原因，約可歸納成下列四點：

(一)受自民黨內部派系鬥爭之影響：自民黨內部派系之爭，由來已久，但自去年十一月池田勇人因病辭職，由佐藤榮作出任首相，內閣閣僚均未予更動，故黨內派系之爭，維持休戰狀態。在參院大選前，佐藤首相為加強內閣陣容，欲以新姿態，贏取這場選舉，故毅然於國會閉會後的六月三日，改組內閣，雖然黨內實力份子三木武夫、藤山愛一郎、石井光次郎、福田赴夫等網羅入閣，但與另一強大政敵河野一郎發生了正面衝突，河野一郎亦拒絕入閣，使自民黨內派系之爭，重開戰端。尤其在推舉候選人時，各派系競爭更為激烈，互不相讓，因此有若干地區，同時有數名自民黨籍候選人競選，使力量分散，此其一。

(二)受東京都議會舞弊案之影響：在本年三月東京都議會選舉議長時，自民黨籍議員被檢舉接受賄賂，十五名議員被捕入獄。都議會亦因此被逼解散，該一舞弊案件，係自民黨議員自導自演，不但受野黨攻擊，亦為一般國民所不齒，使自民黨在國民中聲望，大為低落。此次選舉中，自民黨在東京都選舉區，全軍覆沒，即為明證，此其二。

(三)受經濟不景氣之影響：由於池田內閣推行高度經濟成長政策，使日本經濟，趨於萎縮，尤其是去年十月東京世運會結束以來，中小企業大量倒閉，物價不斷上漲，戰後最大不景氣現象，籠罩

全國，經濟危機，日益嚴重。而國民所直接遭遇的是失業及日常生活受到壓迫。佐藤內閣雖然力謀挽救，但因執政時間尚縮，尚無何顯著好轉跡象，加以社會黨、民社黨、日共等野黨，均以此為攻擊自民黨之口實，遂使自民黨得票數降低，此其三。

(四)受越戰局勢嚴重化之影響：因為越戰局勢的嚴重，美國需要日本在東南亞支援必相對增加，佐藤首相在今春訪美與詹森總統會談時，已公開聲明支持美國在越南政策，佐藤內閣又允准美國原子潛艇在日本寄港，最近更同意提供大量軍需物資援越。佐藤此項措置，皆給予野黨藉口，指責佐藤內閣追隨美國政策，並謂日本政府事實上已介入越南戰爭，使日本國民對戰爭感到不安，進而反對政府，以減低對自民黨議員的投票率，此其四。

佐藤首相在參院選舉結束後記者招待會中，亦曾坦白承認，該黨所受小挫，係由於「黨內紛爭與工作疏失」所致，但同時佐藤亦表示願意藉此反省與檢討，不過佐藤認為就全體而言，成績不惡，並將向理想目標前進。

事實上，就日本整個政治情勢言，其政局發展，受此次參院選舉得失的影響不大，而目前日本所面臨的下列各項重大問題，將是政局發展的關鍵，也是決定佐藤內閣能否長期安定的因素。

(一)批准日韓基本條約問題：佐藤內閣目前計劃，是預定七月二十二日召開臨時國會，至八月下旬通過批准日韓基本條約，建立兩國邦交，現在社會黨、日共正準備採取聯合行動，阻止該條約通過。但以自民黨在參眾兩院力量，只要內部團結一致，通過似無困難。何況民主社會黨及公明黨，在此次參院競選政綱中，表示有條件支持日韓復交，故該條約在國會批准，雖然有困難，但結果可望通過。

(二)如何解決經濟危機：由於池田內閣實施高度成長政策，使日本經濟，正面臨一項嚴重危機，佐藤政府，雖一再設法圖謀挽救，但收效未顯。因此，佐藤首相在本年六月三日決心改組內閣，起用福田赴夫為大藏大臣。福田為以理財著稱之財經專家，為岸派嫡系，必能與佐藤充分合作，此外三木武夫出任通商產業大臣、藤山愛一郎出經濟企劃廳長官，而三木、藤山均係黨內派系領袖，實力

強大，與財經界關係頗深，加以佐藤本人亦為經濟專家，故新內閣財經閣僚，陣容堅強。足見佐藤首相用心之良苦。佐藤新內閣成立不久，即由上述財經閣僚及自民黨幹事長前藏相田中角榮連同橋本內閣祕書長，組成「核心內閣」，而其主要目的，在策定經濟對策，據日本報紙報導，核心內閣，已舉行若干次會議，並已決定了一項「挽救經濟景氣對策」，就財政、金融、貿易，作了統盤檢討，並釐定各項對策，預料今後將依照計劃，逐步推行，計劃之主要方針，將自過去的高度經濟成長政策，改為安定經濟成長政策，安定物價，尤為當務之急。此項經濟危機，將可逐漸克服。

(二)對越南戰局的態度問題：佐藤首相本年春訪美與美國詹森總統會談時，曾明白表示支持美國在越南政策；美國轟炸北越行動，雖然社會黨、日共等極力攻擊，但佐藤首相認為是正當行為。佐藤表示美國在越南地區的若干自衛與報復步驟，完全在理智範圍之內，佐藤首相對反對黨的指責，認為不公並為美國在越南行動辯護，佐藤指出越南問題，應從其整體及歷史來衡量，不能單從美國轟炸北越之得失來討論。從以上這些表示中，日本政府支持美國在越南政策，已極明顯，因此社會黨、日共等反對黨，指佐藤政府已介入越戰，事實上，如果越戰愈擴大，美國需要日本之支援亦更多，社會黨、日共等，必將利用日本國民怨戰反戰心理，策動各項反政府行動，無疑對日本政局影響至大。惟日本由於各種限制，不致公開介入越戰，故問題亦不嚴重。

(四)對匪政策問題：對匪政策問題，一向是困擾日本政府之重要問題，不但反對黨以此攻擊政府，在執政黨內部意見亦不統一。因此歷任首相，都不敢採取堅定政策，佐藤新內閣，似亦不能例外，在本年六月八日自民黨宣佈的外交政策聲明中，雖然主張對共匪問題，表示不急謀解決，但仍強調在「政經分離原則下，促進與共匪的政治、文化交流」。故判斷其對匪政策，似未超出池田內閣時代「對中國問題統一見解」的範圍，而不致有大的改變。

(五)自民黨內部派系問題：目前自民黨在國會兩院勢力，均佔有過半數多數安定席次，如果能團結一致，政權自可安定無虞。惟該黨內部，派系複雜，爭執時起，不但削弱本身力量，且恰與反對

黨可乘之機，尤其在每次選舉或內閣改組，鬥爭更見激烈，阻礙政策推行，影響政局安定。不過目前情況，較過去有若干好轉，因為黨內所謂「黨人派」的河野一郎、大野伴陸等，為佐藤榮作、岸信介、石井光次郎、福田越夫等「官僚派」的主要競爭者，但大野伴陸於去年五月病故，河野一郎亦於七月八日逝世，該兩派勢力大為減弱，且六月三日改組後的佐藤新內閣，陣容業已加強，且大部均係與佐藤關係極深之閣僚，在未來推行政務時，阻力亦大見減少，今後自民黨內部派系之爭可望緩和。

基於上面的分析，今後日本政局，將是在平穩中發展，佐藤政府，亦將是一個長期安定的政權。 五四·七·一〇

·上接第5頁·

我們要鄭重指出，這一決策，可使英鎊不致再度貶值，使工黨政府可以安然度過難關，同時使國際貨幣現行制度免於崩潰。影響之大，可見一斑。

附錄：國際金融首腦題名錄

(完)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理事長：Willam Mechesney。

財政部部長：Joe Fowler (前任為 Douglas Dillon)。

財政部副部長：Fred Deming (前任為 Robert Roosa)。

英國：英格蘭銀行總裁：Lord Cromer。

法國：法蘭西銀行總裁：Jacques Brunet。

財政部部長：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義國：義大利銀行總裁：Guido Carli。

西德：西德銀行行長：Karl Blessing。

董事：Omar Emminger。

荷蘭：荷蘭銀行行長兼國際清算銀行行長：Marius Holtrop。

荷蘭總會計長：Emile van Lennep。

國際貨幣基金總經理：Pierre-Paul Schweitzer。

日 本 與 越 南 戰 局

張棟材

一 前言

日本的主要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等大衆傳播工具，自今年春以來，特別是在美國開始轟炸北越之後，即逐漸掀起一種對越南戰局的報導與評論熱潮，引起並造成日本國民對越南問題的普遍關心，以及是否會被捲入未來戰爭的不安與恐懼等複雜情緒。在那些報導與評論的內容上有一特徵：那就是對美國的越南政策與軍事行動多係表示譴責之意，而相反地對武裝叛亂的越共却有濃厚的同情色彩。

因此，當美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主席羅斯陶於四月間訪日爲美對越南政策圖有所闡釋時，便會驚異地指出：「越南問題深深地抓住著日本人的思想和感情」。而在其旅日期間，更發生了美國務院與日本報界爭論的不快事件，此即副國務卿鮑爾與前駐日大使小麥克阿瑟在國會證言，曾指責日本兩大報「朝日新聞」和「每日新聞」均受共黨份子滲透，故意曲解美對越政策以操縱日本輿情。該兩報乃立即予以嚴詞駁斥；且日本政府亦通過其駐日大使向美提出抗議，事後由美現駐日大使賴世和出面轉圜，方告平息。

根據此種事實，我們可以知道今天日本朝野對越南戰局所持態度及其可能採取之行動，其所受來自大衆傳播最主要利器——報紙雜誌的感染影響力或甚至強制性壓力，實在太大。這是我們在觀測日本對

越南戰局的動向上所應認清的一點。今後日本是支持並協助美國在越南的戰爭；抑中立反對或牽制阻撓美國在越南的戰爭？這不僅是日美關係的問題；也是日本與自由世界關係的一個最大考驗。

二 日本政府所表示的立場

日本政府基於其對內外處境的因應，在起初是儘量避免對越南戰局表示明顯的態度，而以「希望和平解決」，「憲法限制派兵至海外」，「反核子基地化」等口實作爲擋箭牌，亦確能掩飾其曖昧態度於一時。但在潛意識中也存有不满美國在越作爲的反抗。日本政府要員曾經提出所謂「美國人不理解東方人的性格」及「亞洲人之亞洲」等口號，作爲該種反抗的暗示。蓋在有關對越南問題的基本想法和看法上，日本政府便和美國政府有極大的差異。例如日本政府會派前駐英大使，現任外務省顧問之松本俊一爲特使前往越南考察實況，松本返日後在國會證言及在朝日新聞發表之專論，都可反映出日本政府要員們真正內心的共感。首先是對南越民族解放陣線（越共）的構成性質，即與美國的見解發生對立，松本認爲越共是「以南越內部成長的激烈的民族主義運動爲核心」，不能同意美國高級官員所稱越共有百分之九十爲共產主義者的結論。其次是關於能否以武力解決越南問題的看法，則與美方更爲大相逕庭。松本聲稱：「如美國加強對越共攻擊，可能不僅限於越共，勢將引起全越人民都非反美不可，一變而爲悲慘的種族戰爭。」

不過，日本今天所處的地位，正如洛克斐勒於五月間在芝加哥日美協會卅六週年紀念會上所說的一樣：「它的安全保障和經濟成長，是建立在和美國以及西方國家的結合上」，這一個事實，日本政府是絕不忽視的。所以在遇到緊要關頭，日本政府爲了確保其國家利益，仍然是表明了它追隨美國既定決策的立場。其最受國際間注意的有下列三點：

- (一)自美國於二月間實行轟炸北越後，佐藤首相、椎名外相均先後在國會聲明支持美國該項政策；
- (二)執政黨自民黨於五月中旬公開發表統一見解：認爲北越首

先破壞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侵犯南越；越共並非民族主義集團；美爲制止北越對南越之侵略而採取軍事行動，係出於自衛措置；(二)日本亞洲及太平洋地區使領館長會議於五月中旬在東京舉行時，曾強調支持美對越南政府及其關於越南白皮書的觀點；並特別指責日本國內輿論對美國的越南政策的批判與事實不符。日本政府在言論上澄清其對越南戰局的以往曖昧態度之外，也更有間接支援美國在越戰爭的實際行動，且該項實際行動是可以預料到將繼續擴大的。

三 民間論調的一斑

關於大眾傳播之如何影響日本國民對越南問題的視聽，已見前述。故在日本有識之士中，曾對此一病源發出診斷的處方說：「如果美國希望日本人對越南的反共戰爭予以同情支持，必須對來自經由大眾傳播工具中所描述的越戰性質而構成的阻力，加以改善。」(見五月二十日「日本時報」所載「越戰之真相」一文)

民間各種論調匯集起來便形爲大眾輿情，而這種輿情之形成，却受了大眾傳播內容指引的左右。最顯著的例子如：

(一)「每日新聞」朝日新聞」等報派記者至南越，競以潛入越共佔領區爲能事，其所撰述之報導幾每月均見於該等報紙連續刊登之專欄，在題材上則不啻爲渲染越共之「革命」活動大事宣傳。

(二)各大報刊除以社論作主觀之說教外，並舉辦有關越南問題之「民意測驗」，「評論家座談會」，「給美國總統公開信」，「讀者投書」，「越戰專刊」……等，其出發點均爲「反戰」，「反美」之誘導，以求發生煽惑力。

(三)電視放映越戰紀錄影片，均以充分暴露殘酷場面爲主。但取材之對象，並非越共之暴行，而爲越共俘虜被捆綁殺頭之血淋淋恐怖情景，使反共之越戰變質。

知識份子隱身於施用此種編導方式的幕後計劃者，有衆多的具有社會聲譽與號召力的時事評論家、文學作家、教授、社團領袖、政客、舊軍人等名人被捧出來朗讀那些計劃者爲他們所準備下的

台詞。綜合散佈在日本民間對越南問題之各種論調，可舉出下列主要項目：

(一)指美國在他國領土內無權行使自衛權，引戰前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大陸之失敗教訓，並以法國在越與阿爾及利亞之被迫撤退爲近例，作爲勸告美國勿蹈覆轍的殷鑑。

(二)指美國在越軍事行動隨「階梯式之擴大」，將在美日安保條約體制下，有裹脅日本捲入戰爭之危險性。主張日本應「以身爲亞洲人之資格，致力和平解決。」

(三)指越共爲「民族主義者」而「以民族解放爲目的之游擊隊」，斥責美國對民族主義缺乏理解；更有認爲越南共產化亦是一條正當途徑，最低限度將較現在之情況爲佳。

(四)指美國自開始轟炸北越並使用毒瓦斯作戰，出以類似視亞洲人爲化學戰實驗動物之行爲後，已失去在日本之多數友人，並亦將失去在亞洲之多數友人。當前美國的自救之道，唯有立即自動由越南撤兵，萬事交予越人自理。

上述諸論調在以知識份子爲主導，並經左派勢力趁勢呼應下，其企圖達成之一致目標爲製造日本國民的錯覺，使其只認定美國從越南撤退，即可獲致越南問題之解決。

在上述論調之外，自然也還有反共親美，警告日本人「對共產主義的侵略威脅不能過於輕視」的言論，但那顯然是居於少數的劣勢。

四 日本無法置身事外

北越政權和中共匪幫早就叫囂着日本爲協助美國「侵略」的幫兇，且對六月初改組後的佐藤內閣，立刻辱罵爲「反動的新內閣」。這一點充分證明了日本在對越南問題上並不能藉和平呼籲等消極態度，取得對方的諒解，同時，其本身環境亦不容其置身事外，作一個袖手旁觀者。日本椎名外相曾終於公開聲明支持美國在越軍事行動，係屬於履行日美安保條約之義務範圍，這是比較明智而能立信於自由世界的發言。事實上，日本已在從事於間接支援美在越軍

事行動的工作，有了若干具體表現，如：

(一)日本政府與南越政府迄能保持友好合作關係，日本駐越大使高橋，對南越情勢，一向都以正確的研析與建議，來加強日本政府與南越政府的邦交；並反駁日本國內對南越政府的中傷言論。日本對南越致力反共作戰的支援，如助越建設水庫、發電所；參加湄公河地域開發計劃；且派遣醫療隊至越巡迴服務，此皆為極具政治上重要意義之貢獻。

(二)日本政府默許日本船員受美軍雇用，赴越執行運輸兵員、彈藥、車輛、食糧等工作，最近北越及共匪誣指「日本已派軍赴越作戰」，殆即係指此而言。日本之在野黨，如社會黨，亦以此為攻擊政府之口實，由此可見此事已具有日本介入越戰的象徵性。蓋隸屬美海軍部遠東管區軍事海上運輸司令部之十七艘登陸艇(LST)中，現已有八百二十七名日人充任船員，且今後因須再增加八艘服役，預料將有更多之日人海員應募參加。

(三)日本基地所負起的任務，對美軍在越作戰，已發揮了最大的功能。如美第七艦隊係以橫須賀、佐世保等地為基地，他如空軍基地更遍佈本洲及九州，在表面上雖因安保條約規定，須經事前協議關係，而不是使用日本基地直接對越南從事「戰鬥行動」，但這只是法理的彈性解釋。日本政府在協助美軍方面，實已盡了應有的努力，正如推名外相在國會中對在野黨的答辯所稱：「在日美軍向琉球移動，或再開往越南，則已非安保所規定事前協議之對象。」這一點很微妙，也很關重要，因為美軍只要由日本基地經過一下必經之地的琉球，便可使日本基地活用為琉球基地的出發形式。

此外，日本也可能在生產軍火上，執行着供應的使命，但尚未見於公開的事實。北越曾宣稱「在越使用的納波姆彈，有百分之九十二是日本工場製造的。」據日方解釋，那些東西可能是在韓戰時期的剩餘品，現在又從軍火倉庫取出來用。不過，一般所指出的，如日本工場為美軍修理飛機和坦克車等，則是理之當然的事。當年韓戰為日本帶來了復興與繁榮，那是日本在盡到支援反共戰爭所取得的代價。今天日本在支援越南的反共戰爭上，似亦已由躊躇中朝向新的憧憬，有了決定性的抉擇。

五 今後的問題所在點

日美貿易經濟聯合委員會於七月中旬在美舉行了第四次會議。在此次會議中關於討論越南戰局，乃是祕密會議的主題。日本代表(包括外務、財政、農林、通產、運輸、勞動、經濟企劃等大臣)所表示的日本政府立場，是對美協調，但也同時傳達出日本國民的感情願望——期待於越南問題的和平解決。

日本今後能否繼續擴大其對越南反共戰爭的支援，問題已不在於政府的態度如何，而在於政府如何指導其國內人民善加運用和平主義的感情及加深對來自好戰的共產主義之認識。執政黨的自民黨在日本政治文化經濟中心地——東京都，七月份內一連遭受到參院和都議會兩次選舉的敗北，而這兩件事被左派勢力宣傳為日本國民對政府支援美國在越作戰的抗議結果。

當前的一個必須正視的現象是：日本的知識份子和美國知識份子，同樣地立於反政府立場，在進行着訴之於人民大眾渴望和平感情式的抨擊美在越作戰的呼籲和平運動。這兩個國家的知識份子是否會合流，而成爲新的姑息主義勢力聯盟呢？這應是值得警戒的一個尚未形成的陰影。

羅斯陶在訪日時，亦曾與日本的知識階層領導份子，交換意見，發表了他要說服日本一部份人士的主觀偏見的觀點，他說：「美國所得的經驗，是在第二次大戰前，由於西方國家對於在『滿洲』以及在萊茵河的侵略，未能及時加以阻止，才招來以後的人類浩劫。而在第二次大戰以後，却由於美國在希臘、柏林、韓國及古巴採取斷然手段，對付共產主義的威脅，西方世界才得到一個比較安全的時期。」

日本的一部份知識份子，在向人民大眾散佈的一個更危險的毒素思想，是將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混爲一談，且認爲落後地區國家的共產主義化，亦不失爲一走向近代化之途徑。因之，他們並不承認共產主義的威脅。

今後的問題是日本能否更積極地支援越南的反共戰爭，端視日

本政府重視大眾傳播利器為禍為福之效果，竭謀如何正確指導其國民意志不受共產主義滲透的毒素思想干擾而定。這不是日本當局坐視以求逃避就可安然渡過的事。最近美國的耶魯大學教授、名政治學者卡爾·杜伊秋曾在日本向日本的一些學者們發出他的諍言說：「如美一旦自越撤退，那日本在亞洲對共產主義防禦線上的地位，便居於最前線了。故為日本的國家利益計，縱將其自衛隊投入越南戰場，亦屬有利之局。」此一諍言不啻道出了日本沉溺於苟安和平的後患，但在目前尚難以為日本朝野所接受。

六 結語

日本政府對越南戰局雖然逐漸擺脫其曖昧立場，而有了間接支

現階段共匪之統戰政策

共匪統戰政策的中心問題，是一個和資產階級聯合的問題，目前共匪雖然對資產階級進行各種的壓制和打擊，但是和資產階級聯合這一基本政策在短期內還是不會改變的。因此我們觀察共匪統戰政策的演變，不能僅限於表面的現象，而必須深入分析它的具體措施。

張敬文

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今年一月四日，共匪在北平召開了偽第三屆全國人代會第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中，周匪恩來作了「政府工作報告」。這個報告的第二部份，是所謂「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從這一部份報告中，我們發現在過去一個時期，共匪的統戰政策曾經遭到嚴重的失敗；同時我們又發現，共匪的統戰政策正在經歷着一種並不十分明顯而却是十分重要的演變。這樣，就使得我們有必要結合這一次會議以前和以後的一些有關情況，來具體探討一下這一個問題。這裏我們所指的有關情況，首先是偽第三屆全國人代會代表的選舉和偽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的派任，其次是匪黨中央統一戰線部部長李匪維漢（還有匪黨中央統一戰線部副部長張匪執一）的整肅。因為偽第三屆全國人代會代

援越南戰場上反共戰爭的實際行動，但依然是並未完全放棄其妄圖以和平使者，求得解決的二重性格。如在日美貿易經濟聯合委員會舉行會議前後，三木通產相之赴法、蘇；椎名外相之赴法，皆係與戴高樂、柯西金之直接會談，以進行所謂先求停戰，召開國際會議，以和平解決越局的遊說工作。

容或日本的此種努力，亦有其充分理由根據，但英國在此種努力上徒招自辱的失敗先例，應為日本政府所深知。更何況來自河內與北平的對佐藤新閣的惡罵，根本就早已否定日本所妄圖的和平使者資格了呢？因此，我們可以預言：日本如不完全放棄上述的二重性格行徑，這不但要引起亞洲堅決反共國家的反感，也會為其本國內部挑撥更大之混亂的。

表的選舉和偽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的派任，以及李匪維漢的被整肅，和共匪統一戰線政策的演變是密切關聯着的。

一 共匪統戰政策的失敗

共匪的統一戰線，從階級的角度來說，是以所謂「工農聯盟」為基礎，而以爭取和聯合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為主要目標。但是如果進一步加以分析，則所謂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實際上包括了社會上的許多階層，以及許多特定的團體和成份。現在我們如果把這些階層、團體和成份大體歸類一下，則共匪統戰的對象，應該包括附匪黨派、知識份子、資產階級（即工商業者）、少數民族、華僑和宗教人士，而其中又以附匪黨派、知識份子、資產階級和少

數民族居於重要的地位。但是過去幾年，正是這些人從多方面對共匪進行了激烈的反抗，這就證明了共匪的統戰政策遭到了嚴重的失敗。

根據周匪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我國經濟遇到暫時困難，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國內的階級敵人又一次向社會主義發動進攻」。周匪恩來的所謂國內的階級敵人的進攻，指的是什麼呢？指的就是有不少的人在國內問題上積極鼓吹「三自一包」，在國際問題上宣揚「三和一少」，而所謂「三自一包」，就是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場、多搞自負盈虧企業，包產到戶；所謂「三和一少」，就是對帝國主義、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妥和，對各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支援要少。另據郭匪沫若對偽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所作的「工作報告」，這種「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論調，不是來自別的地方，而是來自偽政協，而偽政協本身便是共匪的一個統一戰線組織，這不就證明共匪的統戰政策是失敗了嗎？大家知道，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是共匪對內經濟情勢迅速走向惡化的時期，也是共匪對外和蘇俄的關係迅速走向惡化的時期。當時共匪為了防止經濟情勢的繼續惡化，曾經在「人民公社」問題上作了一定程度的退却，這就是發還農民自留地，開放農村自由市場，實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三級所有制，和允許農民經營家庭副業。但是在對外關係這個問題上，共匪却執行着一條強硬的路線，絕不肯作出任何的妥協。被網羅在偽政協之中的一些附匪黨派份子、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鼓吹「三自一包」，宣揚「三和一少」，與共匪有限度的退却策略和對外的強硬路線相背馳的，所以共匪認為他們是用資產階級觀點、修正主義觀點，來同匪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對外政策總路線」相對抗，是向社會主義發動的又一次進攻。這就說明共匪的統一戰線不但沒有能够在政策領導上使附匪黨派份子、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跟着它走，反而受到附匪黨派份子、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強烈的抗拒了。

共匪不能在政策領導上使附匪黨派份子、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跟着它走，在思想領導上也不能使附匪黨派份子、知識份子和資產

階級跟着它走。周匪恩來在同一報告中說：「最近，一些部門中和報刊上對『合二而一』、『各階級匯合的時代精神』、『寫中間人物』等等資產階級觀點、修正主義觀點和一些壞戲、壞電影展開了批判，在哲學、政治經濟學、歷史科學、教育、文化藝術等領域內，就一系列原則性問題進行了大論戰」。這裏周匪所指的「合二而一」，是楊獻珍提出來的；「寫中間人物」，是邵荃麟提出來的。誠然，這些觀點和共匪的正統觀點都有所不同，但是提出這些觀點的人並不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之他們還自命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這樣說來，即使他們的觀點和共匪的觀點發生分歧，亦不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之間存在的分歧，本來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可是共匪却把這個所謂「大論戰」的性質，看成是：「究竟是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究竟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服務，還是為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服務，為資產階級以至地富反壞右服務？究竟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是搞修正主義？究竟是宣傳無產階級的革命的辯證唯物主義，還是鼓吹資產階級的反動的唯心主義？」大家知道，共匪通過偽政協執行它的統戰政策的一項最主要的任務，是對附匪黨派份子、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進行徹底的思想改造。可是現在共匪承認，附匪黨派份子和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總是多方找尋藉口拒絕思想改造（見郭匪沫若對偽政協三屆全委會第四次會議的報告），這就說明共匪的統戰政策在思想領導方面也是明顯地失敗了。

但是共匪的統戰政策，還是以在少數民族中間失敗得最慘，依據共匪公佈的數字，大陸少數民族一共有三千多萬人，可是這些年來，不管共匪對他們是進行懷柔、籠絡，還是進行打擊、鎮壓，他們總是和共匪處於尖銳對立的地位。一九五九年春天震動世界的西藏人民抗暴革命不用說了。這一次周匪報告，又給我們透露了兩件我們知道得不够詳細或者一無所知的事實。前一個事實，就是一九六二年在新疆有一批共匪所謂「最反動的地方民族主義份子，在伊寧發動了叛國的反革命的武裝叛亂，煽動和組織大批邊民外逃。」周匪在報告中暗示，這一次的新疆少數民族的武裝起義，是由蘇俄

策劃和直接指揮的，但是共匪對少數民族的一切政策措施如果都能使新疆的少數民族心悅誠服，蘇俄又怎能策劃和指揮得了？因此，新疆少數民族的武裝起義，只能解釋為共匪對少數民族的統戰政策的徹底失敗。後一件事實是，所謂「以班禪為代表的反動農奴主集團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反人民、反祖國、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大家知道，班禪是由共匪一手培養起來用以對抗達賴的傀儡，在達賴出走印度之後，他一直是被共匪捧得很高的。可是即使如此，他還是走上了達賴的同一條道路，以致迫使共匪不得不撤銷他的偽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副主任委員和代理主任委員的職務，甚至在這一屆的偽人代會中也沒讓他充當一名代表，而只在偽政協四屆全國委員會中給他保留一個委員的名義（班禪原來是偽二屆人代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偽政協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這就可見共匪對西藏少數民族的一切所作所為是如此的不得人心，甚至連班禪這樣的一個人也為良心所驅使而不得起來反抗它了。

如上所述，單單拿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這一個時期來說，共匪對附匪黨派份子、知識份子、資產階級和少數民族所執行的統戰政策，基本上是失敗的。肯定了這一點，那末我們亦就可以說，共匪在一九五九年以前所執行的統戰政策，也沒有獲致成功。因為如果前一個時期是成功的，就不會出現後一個時期的失敗了。

二 共匪統戰政策的演變

共匪的統戰政策，自從偽政權成立以來，並沒有發生基本的變化。但是如果拿共匪實行「三面紅旗」失敗以後到目前這一個時期來加以考察，則共匪在執行統戰政策的重點和具體措施上，前一個階段和後一個階段是有所不同的。而這兩個階段的劃分，應該以匪黨中央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作為一個主要標幟。因為正是在這一次會議上，毛匪澤東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號召。不過共匪再度公開強調階級鬥爭的立場來觀察和對待資產階級、附匪黨派和統一戰線問題，還是這一次偽第三屆人代會第一次會議的事。而我們拿這一次偽第三屆人代會第一次會議周匪恩來所作的「工作報告」和一九六二年三月偽第二屆人代

會第三次會議周匪恩來所作的「工作報告」作一比較，就不能不承認共匪的統戰政策，已經在某種程度上發生了變化。我們如果把這種變化集中為一點，那便是在前一個階段，共匪的統戰政策比較是強調聯合，而後一個階段則比較是強調鬥爭。

共匪對內統戰的範圍，如上文所說，一般包括附匪黨派、知識份子、資產階級、少數民族、華僑和宗教人士。自從「三面紅旗」失敗之後，共匪一方面為了緩和大陸各階層人民的不滿，另一方面為了取得附匪黨派、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的支持和合作以渡過難關，就開始對他們採取了一連串懷柔和拉攏的措施。現在我們看到，打從一九六一年開始，共匪對附匪黨派、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的思想改造，是採取了比較溫和的所謂「神仙會」的方式，以代替過去的「思想鬥爭」，同時還停止了他們所深痛惡絕的「勞動鍛鍊」。到了一九六二年三月共匪召開偽第二屆人代會第三次會議，為了進一步擴大統戰策略的運用，又透過周匪恩來的「工作報告」，對匪黨的統戰政策，作了全面的闡明。現在我們歸納當時共匪執行的統戰策略，主要有如下七點：

(一) 對附匪黨派強調繼續貫徹執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並且允許附匪黨派「重新發展組織和展開基層的組織活動」。

(二) 對文學藝術領域中的知識份子強調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所謂人民內部矛盾中嚴格劃清政治問題、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的界限，反對用簡單粗暴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同時強調現在的知識份子絕大部份已經成為勞動人民的知識份子，並且提高高級知識份子的食物配給。

(三) 對「民族資產階級」決定「把他們的定息從一九六三年起延長三年，到時再議」。

(四) 對「少數民族」強調要加強「國內各民族的團結」，加強民族工作，並且特別着重指出必須重視各民族的特點，認識民族的差別性和這種差別長期性，並正確認識少數民族中的宗教問題和民族問題的聯系；切實尊重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和自治權利，正確處理民族關係。

(五)對「海外僑胞」強調要「團結一切愛國華僑和海外僑眷」，並且再度申明繼續堅決貫徹保護僑匯政策，華僑在國內的生活資料包括房屋、存款、投資在內，過去、現在、將來永遠都歸華僑私人所有。

(六)對「宗教徒」強調要「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七)對「非共產黨員」強調要「加強合作」。

大家知道，在「三面紅旗」失敗之後，共匪曾經在經濟改革上採取了一連串退却的措施。這些退却措施反映到政治上來，便是由攻勢轉為採取守勢。以上所列舉的七點，便是這種守勢的具體說明。但是到了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共匪認為大陸經濟情況惡化的趨勢不但已經停止，而且還開始現出好轉的跡象之後，它在經濟上就由退却轉而採取守勢，而在政治上就由守勢轉而採取攻勢了。毛澤澤東在匪黨八屆十中全會作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號召，便是這種轉變的一個信號。而緊接在這個信號之後，共匪就在全匪區廣泛開展了一個所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共匪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從下層開始的。因此當它對共匪的統戰政策產生明顯的影響，已經是在兩年之後。現在我們拿周匪恩來在偽第三屆人代會第一次會議中所說的有關統戰政策的話和前面七點相比，在語調上顯然有很大的不同。請看周匪恩來是怎樣的：

(一)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周匪恩來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過程，正是思想鬥爭的過程。只有在同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中，才能發展無產階級思想；只有在同毒草的鬥爭中，社會主義的香花，才能更好地開成。」

(二)關於知識份子，周匪恩來說：「在文化革命的洪流中，所有的知識份子都不能放鬆自己的改造。知識份子改造的根本途徑是：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澤東著作」，「要長期地深入工農兵羣衆，參加階級鬥爭，參加生產勞動，使自己革命化、勞動化。」

(三)關於資產階級，周匪恩來說：「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

現階段共匪之統戰政策

階段，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仍然具有兩面性，這就是說：既有被迫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可能性，又有強烈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的反動性。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和平改造，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經過長期的武裝鬥爭取得了國家政權的條件下，依靠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一種特殊形式。它的目的，就是要經過長期的階級鬥爭，最後徹底消滅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而決不是取消階級鬥爭，調和階級矛盾，保留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

(四)關於附匪黨派，周匪恩來說：「中國共產黨對各民主黨派堅持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是以階級和階級鬥爭的長期存在為前提的」，是以毛澤澤東「所提出的六條政治標準作為共同準則的」。「民主黨派同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過程，也就是逐步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就是逐步改造成為在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的過程的。」

(五)關於少數民族，周匪恩來說：「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毛澤澤東語)。「我們就是根據這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來觀察和處理民族問題的」。「離開階級和階級鬥爭來觀察和處理民族問題，只能助長民族分裂主義，不利於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

如上所述，當前共匪統戰政策的中心內容，一句話，就是強調「階級鬥爭」。這和一九六二年三月周匪恩來在偽第二屆人代會第三次會議上所闡述的統戰政策，無疑的是一個鮮明的對照。

最後我們要指出這一點，共匪在召開偽第三屆人代會第一次會議以前，曾經根據過去幾年附匪黨派、知識份子、資產階級和少數民族反抗的事實，對「三面紅旗」失敗以後一個階段的統戰政策的執行作了檢討，認為這一個時期的統戰政策犯了「投降主義」的錯誤(見周匪恩來的報告)，而要匪黨中央統戰部部長李匪維漢對這個錯誤負責。因此在偽第三屆人代會第一次會議之後，李匪維漢就被剝奪了偽人代會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偽政協副主席的職務，而僅保留一個偽人代會代表和偽政協委員的頭銜；並且接着又被剝奪了匪黨中央統戰部部長的職務，而由副部長徐匪冰(即邢匪西萍)取而代之。其實李匪維漢所執行的統戰政策，並不是他自己製訂的政策，

而是匪黨中央製訂的政策。不過因為這個政策失敗了，現在匪黨中央要實行政策的轉變，就只好拿李匪維漢來充當替罪的羔羊了。

三 共匪統戰政策的特點

然則當前共匪的統戰政策，具有那一些特點呢？爲了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對僞第三屆人代會和僞政協四屆全國委員會的組成進行比較深入的分析。

共匪的統戰政策，係以所謂「工農聯盟」爲基礎。當前共匪統戰政策的第一個特點，便是儘量擴充這一個基礎。這話怎樣說呢？這一次共匪選出的僞第三屆人代會代表，一共是三千零四十名，比上一屆的一千二百二十六名增加了一千八百一十四名，即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其中婦女代表由上屆的一百五十名增加到本屆的五百二十一，少數民族代表由上屆的一百五十名增加到本屆的三百名。但是無論從全局觀察，還是從局部觀察，所增加的代表，大多數不是工農「勞動模範」，便是「先進生產者」。以西藏地區的本屆代表爲例，全部代表二十四人中，就有七個是所謂被解放的「農奴」。這說明共匪在這一屆僞人代會代表的選舉中，特別強調執行其所標榜的「階級路線」。這反映到僞人代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上，便是匪黨黨員比重的顯著增加。拿該委員會的副委員長來說，上屆十六名中，匪黨黨員一共佔了八名；本屆十八名中，匪黨黨員一共佔了十名；再拿常務委員來說，上屆一共是六十一名，本屆一共是九十六名，即本屆比上屆增加了三十五名，但這三十五名中有二十名是匪黨黨員，其餘十五名是科學家。這就是說，經過這一屆代表的改選，工人、農民和匪黨黨員的比重是大大地提高了，反之，僞民主黨派、資產階級和其他成份的比重則是相對地下降了。

當前共匪統戰政策的第二個特點，是大力爭取自然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這是因爲這些人是共匪從事所謂「經濟建設」所必需的，也是共匪發展國防科學特別是發展核子武器所必需。現在我們看到，這次共匪新選出的僞第三屆人代會代表，除了工農「勞動模範」佔有很大的數目之外，自然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也佔了一個相當的數目。而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本屆僞人代會常務委員會新

增加的三十五個常務委員中，有十五名是匪區知名的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他們是貝時璋（生物學家）、王淦昌（核子物理學家）、葉渚沛（冶金專家）、錢崇澍（生物學家）、嚴濟慈（技術科學專家）、吳有訓（物理學家）、張鑾（外科專家）、林蘭英（半導體專家）、林巧稚（婦科專家）、俞靄峯（婦科專家）、孟繼懋（外科專家）、趙九章（地理物理學家）、趙忠堯（核子物理學家）、梁思成（建築專家）、童弟周（生物學家）。至於一般的高級知識份子，當然亦在共匪爭取之列，但是比起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來，他們顯然是居於次要的地位了。

共匪僞第三屆人代會代表的情況既如上述。現在我們再來看一看作爲共匪名符其實的統戰組織的僞政協又如何？共匪這次公佈的僞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的名單，是：匪黨、僞民革、僞民盟和僞民建各四十名；僞無黨派民主人士、僞民進和僞農工民主黨各二十名；僞中國致公黨八名；僞九三學社二十名；僞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八名；僞青年團十名；匪總工會三十八名；農民十六名；僞全國青聯八名；僞合作社十一名；僞工商聯四十名；僞中國文聯五十二名；僞中國科技協會六十名；僞社會科學團體二十名；僞教育界四十二名；僞新聞出版界十一名；僞醫藥衛生界四十名；僞對外和平友好團體二十二名；僞社會救濟福利團體十一名；華僑十七名；少數民族三十六名；宗教界十六名；所謂特別邀請人士四百三十九名。和上屆比較，本屆僞青聯少了兩名，僞社會救濟福利團體少了一名；宗教界少了兩名，所謂特別邀請人士多了一百三十一名，其餘完全相同，而所謂特別邀請人士多數是工農份子以外的各方面的人物。因此單拿僞政協來看，共匪對工農以外的各種人物的統戰，就某種意義來說，也是擴大的。在這中間，值得特別指出來的有兩點。第一點是除了去掉一個章乃器以外，上屆僞政協中的所有「右派份子」，共匪都在這一屆的僞政協中加以保留，而且還增加了一個章伯鈞和一個羅隆基。由此可見共匪對一般知識份子的爭取，基本上是沒有放鬆的，因爲這些「右派份子」絕大部份都是比較知名的知識份子（章乃器的被除名，乃是因爲他不肯承認錯誤）。第二點是共匪在這一屆的僞政協中，容納了一部份被俘以後服刑期滿的

前國軍將領，也容納了偽滿洲國皇帝溥儀，這就顯然是企圖利用他們來開展它對台灣這一個全世界的反共堅強堡壘的心戰攻勢了。

最後，共匪既然在最近幾年不斷強調「階級鬥爭」，我們就必須必要來論述一下共匪在執行其統戰政策中如何對待資產階級這一問題。從總的方面說，共匪對資產階級是一貫執行所謂「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這一個政策，到今天還沒有改變。因此共匪雖然一再強調爲了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爲了防止資產階級思想的泛濫和資本主義的復辟，必須對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進行堅決的鬥爭，我們仍然看到許多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繼續充當偽人代會的代表和偽政協的委員，繼續充當共匪的偽正副部長或偽正副省長。但是在實際的日常政治生活中，現在在匪區的資產階級却受到從來未曾有過的歧視。舉一個例子來說，現在在匪區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不管學業的成績怎樣好，一律被排除在高等學校的大門之外，共匪所持的理由是這些青年不是他們所要培養的對象。至於已經進入高等學校的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則和地主、富農出身的青年一樣，受到各式各樣的歧視的待遇。前些時候匪人民日報曾經就這個問題對讀者作了解答，說是共產黨人並不是「唯成份論」者，對於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同學，應該看他們的表現，區別對待，而不應該一律加以歧視，足以反證這些青年在匪區高等學校中所受到的歧視之深。由此一端，可見今天共匪對大陸一般的資產階級，是儘量加以壓制、打擊的。如果共匪還沒有斷然和資產階級一刀兩截，那只是由於一方面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科學技術上對它還有利用的價值；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在社會上的影響力還是十分強大（周匪恩來語），在走頭無路之餘，就會對它實行強烈的反抗。

現階段共匪之統戰政策

息延長呢？這應該是我們在未來一段時間探測共匪統戰政策演變的一個重要的標幟。

（上接第33頁）

六歲至四十歲者佔全黨黨員百分之四六點八。從以上這些數字看來，俄共青年黨員激增，對俄共黨內有莫大影響力，青年黨幹重視技術超過馬列主義思想，強烈的要求黨內民主與自由，不重口號而重實際，世界革命與蘇俄國內建設并重，使俄共黨內思想顯著的改變。

（四）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止，俄共黨員及候補黨員受完高等教育者，共計一百七十六萬三千二百六十二人（佔總數百分之五），受完中等教育者三百五十四萬二千零五名（佔百分之三〇點一），黨員專家共計四百零六萬三千五百三十人（佔所有黨員百分之三四點六），黨員及候補黨員中有候補博士六萬三千一百二十人，博士六千七百八十三人。黨內受高等教育人數激增，使黨內成份變質，出現中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思想，彼等多重視物質生活享受，對政治漠不關心，此等技術工程專家，在俄共黨內佔重要角色，彼等將逐漸排除黨內官僚。前蘇俄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烏斯季諾夫調任俄共中央書記，即以代表黨內技術專家爲背景。

（五）俄共第廿三屆新中央委員屬於下列三種中委將被落選：①黑魯曉夫親信份子如前被免職之真理報總主編薩丘柯夫等，②前被免職之俄共中央書記波爾雅柯夫等，③如本年二月十一日被免職之全俄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阿里遜斯基（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曾任蘇俄農業部長），黑魔下台後即受整肅之蘇俄科學院實驗遺傳學研究所所長李森科院士等。屬於下列各項者仍將爲俄共第廿三屆新中央的核心份子：①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及候補委員，俄共中央書記，俄共中央各部重要部長，各省黨部及各邊區黨部之第一書記，及十四個共和國黨中央第一第二書記。

②陸海空軍總司令及第二次大戰有功勳之元帥、德蘇戰爭時期之蘇聯英雄。

③蘇俄部長會議所屬各部部长及國家委員會主席及十五個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等。

（完）

李柏曼建議與蘇俄計劃工作改制

呂律

壹 引言

蘇俄是一個採行計劃經濟的國家，它要達到預定的目的——從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經社會主義的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社會，就必須用難以數計的不同性質的計劃，依照計劃的規定去塑造。這是一件複雜精密的工作，必須像它自己的東方二號和美國的雙子星太空船那樣準確才行，否則，差之毫厘，即謬以千里。

蘇俄立國已四十七年，在這期間，不但遠未看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邊緣，即號稱基本上業已完成了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也發生不能再行自欺欺人混下去的情況，必須面對事實改絃更張，足見建設一個理想中的國家，計劃上的複雜性和精密程度，又非東方二號和雙子星太空船可比。

蘇俄建國的根本計劃，稱為國家計劃，它的基礎是俄共的黨綱。列寧曾經指出：蘇俄的計劃，乃布爾希維克黨綱的具體化，乃黨綱總路線的具體化。又稱：布爾希維克的黨綱，不應祇單純的是一個黨的黨綱，并應成為蘇俄經濟建設的綱領。列寧將他手訂的全國電氣化計劃名為俄共第二黨綱，即其一證。

蘇俄「計劃經濟」月刊，曾發表「論布爾希維克式計劃」一文，其中指出：布爾希維克計劃化的要點，即在於：不論在長期計劃中，或是任何時期內具體的、極微細的生產任務中，完完全全是從共產黨的政策上、從共產主義建設的任務上出發，國民經濟計劃化，乃是為布爾希維克的總路線而鬥爭，為增強蘇俄的威力而鬥爭，為共產主義而鬥爭的最重要的部份。

因為蘇俄的國家計劃是體現俄共黨綱的工具或形式，所以史達林說：蘇俄的計劃，不是猜想和摸索的計劃，而是一種指令式的計劃，是領導機關必須遵守的計劃，是決定蘇俄經濟發展未來方向的計劃。

蘇俄經濟學家科夏琴克論「國家計劃即是法律」時指出：國家計劃，乃是不容許任何企業違背的法律，嚴格遵守計劃的紀律，無條件完成國家計劃，乃是每一個經濟機關領導者的神聖任務。

總之，不論把國家計劃視為黨綱也好，視為指令和法律也好，都證明了一點，即蘇俄計劃的創制程序是由上而下的，而不是由下而上。此種計劃工作制度，後來發現流弊日多，導致年度計劃和每一屆五年計劃的執行結果華而不實，尤其在經濟結構日趨複雜、科學技術的發展一日千里的戰後時代，不能再死守計劃工作的教條，必須將計劃工作的體制重行改造。

貳 蘇俄計劃工作改制的前奏曲

蘇俄要改進計劃工作的體制，並不是從李柏曼發表其有名的「計劃、利潤、獎金」建議才開始的，也不是為實施俄共新綱領的規定才採取此項步驟，而是早在一九五七年實行經濟權下放——建立各地區國民經濟委員會的時候，黑魯曉夫就強調這一點，並且從事計劃工作的改進事宜。黑魯曉夫在一九五七年「關於進一步改進管理工業和建設的組織工作報告提綱」中，對於改進計劃工作的要旨曾提出以下兩個要點：（一）關於經濟管理權下放的辦法，他主張成立各地區的國民經濟委員會，理由是「根據當前國民經濟發展

階段進一步提高國民經濟的任務，必須把工業和建設日常領導的重心移到地方上，使其更加接近企業和建設單位。為此，顯然應當改變過去那種通過各專業部和主管機關進行管理的組織形式，採取新的分區管理的形式。這些國民經濟委員會的任務，他指出，「將包括制定和實行長期和短期生產計劃，制定企業專業化計劃，生產協作計劃，經濟行政區內部及其他省和共和國互相供應原料和半成品的計劃，編製和實行物資技術供應計劃。」(二)關於集中領導問題，他主張加強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職權，以期收到民主集中制的效果。關於這一方面，他所持的理由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要求必須對國民經濟實行有計劃的集中領導」；又說：「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部經驗證明，對國民經濟實行集中領導，共產黨指導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乃是社會主義經濟不斷高漲的保證。國家計劃使黨和政府有可能統一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和步調，最合適的利用我國的經濟資源，把這些資源來解決國民經濟中最重大的任務」；又說：「在國家大事異常複雜化的現時情況下，往往要解決很多錯綜複雜的問題，在這裏，需要國家計劃委員會鑑定的和不需要它鑑定的問題是交錯在一起的，而且需要國家計劃委員會鑑定的某些方面和不需要它解決的方面交錯在一起的，因此，我想，在目前，應採取步驟來擴大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職權。」他認為國家計劃委員會不應干預經濟行政區——各地區國民經濟委員會——的行政管理，它的職責是研究各地區發展中的重大問題，通過計劃確定國民經濟發展方向和速度，規定各加盟共和國和各經濟行政區國民經濟各部門發展的必要比例。因此，他要求「蘇俄國家計劃委員會必須徹底改進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編製的工作，計劃工作必須做到在當年就確定下一年的主要計劃指標，在本五年計劃期內就確定下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輪廓。這些計劃指標都應分加盟共和國并每一經濟行政區進行編製。國家計劃委員會除編製國民經濟長期計劃外，還應編製年度的計劃。」他進一步說明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職權，是「應在各國民經濟委員會和各加盟共和國國家計劃委員會所訂計劃的基礎上進行綜合的計劃工作。無論長期計劃和短期計劃，都必須在考慮每一個經濟行政區的一切可

李柏曼建議與蘇俄計劃工作改制

能性的基礎上進行編製。在制定綜合計劃時，國家計劃委員會要研究考慮：已制定的地方計劃，其正確程度如何，這些計劃在該地區將產生何種效果，它們在多大的程度上符合發展全國國民經濟的利益，以免發生比例失調的現象，保證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均衡發展，使各經濟行政區發展經濟的計劃互相銜接。」

一九五七年五月召開的蘇俄最高蘇維埃第七次大會，對於這個問題也指出：「計劃工作嚴重的缺點是這樣的：從這一年度轉到另一年度及從這一屆五年計劃轉到另一屆五年計劃時，我們就開始重新計劃，可是一年終了，我們某些企業和建築單位直到一年的最後一刻還未接到下一年度的計劃。生活的過程是不間斷的，而計劃豈可以在一定的年度時期予以脫節？」

一九五七年以後的幾年，關於計劃工作問題曾通過三個重要的國家文件：一、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俄共中央與蘇俄部長會議的決議——「關於改進國民經濟計劃工作的措施」；二、一九六〇年四月七日俄共中央與蘇俄部長會議的決議——「關於進一步完善國民經濟計劃工作和領導問題」；三、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廿六日俄共中央與蘇俄部長會議的決議——「關於保證發展蘇俄國民經濟計劃工作的持續性」。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最後一項決議，因為它證明蘇俄政府的計劃工作方法有走向質的改變的決心。這一決議的思想在於：計劃工作要做到使國民經濟在每一年都有其五年的具體的遠景發展計劃，此項遠景要反映科學技術的進步，保證比例的正確，它是合理的。

一九六〇年的決議，關於計劃工作的一般路線，是與一九五七年黑魯曉夫的指示相合的，但是這個決議并未指明具體的措施是什麼，祇是規定召開一個計劃工作不間斷的會議。此項會議會在一九六一年三月由科學——經濟研究所加以籌備，其中參加的有：蘇俄國家經濟委員會、蘇俄國家計劃委員會、蘇俄中央統計局、蘇俄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蘇俄財政部科學財政研究所，除此之外，尚有各加盟共和國的計劃機關、各國民經濟委員會、各部、各國家委員會、各工業企業、各科學機關的工作人員等。這個會議，以計劃工作

中不間斷的必要性為出發點，主張實行遠景的和現行的國民經濟計劃互相結合的制度，建議政府實行下列各點，以保證實現計劃工作中的持續性：一、按五年分期的十五——二十年的遠景計劃；二、遠景的五年計劃；三、年度計劃和下一年度的控制數字。

蘇俄發展國民經濟的一五——二〇年遠景計劃，是整個計劃工作制度的根本。這個遠景計劃分成幾個五年來擬訂，於是這些五年一期的計劃就是實現建立共產主義物質技術基礎綱領一貫相承的一些階段。

這個會議的參加人士得到一個一致的結論：計劃工作的持續性，祇有在那樣的時候才能得到保證，假如遠景計劃業已建立起來，屬於這個遠景計劃的一些五年計劃也已建立起來。

五年制發展國民經濟計劃，在計劃工作各個環節中都要擬訂，從企業和地區國民經濟委員會開始，到中央級的計劃機關為止。經過中央必要的審核之後，予以批准，並且在下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前一年內發交各地區國民經濟委員會和各企業。

計劃工作各環節，在五年計劃的基礎上每年要依照全部指標擬訂年度計劃，同時還要規定下一年度的控制數字。其擬訂的程序，也是由下而上的。這些年度計劃和控制數字經核定後，也按規定順序發交各企業執行。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蘇俄的計劃工作向前推進了一步：在史達林時代的計劃工作，是由上而下制訂的，到這個時候已改了一個方向，按照黑魯曉夫的指示，由下而上擬訂，因為各企業對於自己的可能性知道的比任何人都清楚，它們的計劃應該是實際的。

從理論上說，蘇俄計劃工作制度向前推進的第二步，是俄共新綱領關於這個問題的規定。這個經一九六一年俄共第廿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綱領指出：「共產主義建設要求在加強和完善國家對國民經濟集中領導的同時，要全力發揚民主的管理原則。在統一的國民經濟計劃的範圍內，地方機關和企業的經濟獨立性和權限將進一步擴大，來自下面（從企業起）的計劃和建議，應在計劃工作中起日益增長的作用。」這個綱領進一步的具體指出：「集中的計劃領導應該主要集中在下列各方面：在儘量考慮來自下面的建議的情況下

，制定和保證完成國民經濟計劃的最重要的指標，使各地方擬定的計劃互相協調和銜接；推展科學技術成就和先進經驗；在技術進步、基本建設投資、生產佈局、勞動報酬、價格、財政方面實行統一的國家政策，以及執行統一的核算和統計制度。」又說：「為了動員內部潛力，更有效的利用基本建設投資、生產基金和財政資金，必須在國家計劃任務的基礎上擴大企業的業務獨立性和主動性。必須大大提高企業在採用先進技術方面的作用。」

不過，俄共新綱領所標榜的種種計劃改革，據一九六二年出版的「經濟問題」月刊第十二期上所載E·馬野夫斯基和A·傳敏的一篇「完善國民經濟計劃工作的幾個問題」——說，各計劃機關直到那時為止，尚未能保證完成俄共新綱領所規定的重要任務，就是「必須在把年度計劃和長期計劃有機的結合起來的情況下，在得到撥款和材料——技術物資的保證下，不間斷的進行。」這篇文章寫道：計劃工作的持續性，有一不可缺少的條件，即在撥款和物質技術的供應方面得到充分保證，否則，就要時加修改。關於這一點，作者舉出事實例證，以支持他們的結論：雅羅斯拉夫爾國民經濟委員會，一九六〇年在計劃期間，對於年度計劃各章作了七九八個修改，其中有三〇七個修改是遵照上級計劃機關的指示所作的；富拉狄米爾國民經濟委員會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內，依照該會各部門管理局的意見，在總產量計劃中作了二〇個修改，各企業的生產綱領也有相應的修改，譬如，富拉狄米爾化學廠的總產量計劃，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內作了八個修改。

馬野夫斯基和傳敏二人的文章證明了一點，即黑魯曉夫自一九五七年以來的倡導和俄共新綱領的規定，祇不過在舊的計劃工作制度的軀體上加上兩件新衣而已，它的靈魂、思想、作法和習慣依然如故，對於挽救蘇俄經濟危機既無幫助，而加深這個危機却有相當作用。李柏曼認為「現行的計劃制度，其中鼓勵企業的辦法，無異是提高產品品質和掌握新式產品的障礙」，其故在此。

現行計劃工作主要的缺點之一，是它建築在上一年度總結的基礎上，流弊所趨，工作良好的一些企業，在下一年度要比運用內部潛力不佳的企業所得的待遇為差，因此，就減弱了它們對業務的關

切，沒有一個企業領導人會向國民經濟委員會要求更高的生產任務，相反的，都竭力要取得輕而易舉的計劃，亦即在此種計劃之下，提供的產品可以少一點。

關於李柏曼及其支持者批評現行計劃工作制度的意見，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以後，在蘇俄社會中已引起廣泛的共鳴，即使是反對李柏曼的教條主義者——費多羅維奇教授——也不否認他所批評現行的計劃工作制度不能刺激各企業領導人發揮潛力和爭取更緊張的計劃，是正確的。

叁 關於蘇俄計劃工作改制的論戰

一九六四年，是蘇俄經濟學家和經濟工作人員們圍繞着蘇俄計劃工作問題論戰的一年。

此項論戰的開始，應當自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八日出版的「文學報」上發現納塔麗雅·伊莉英娜一篇隨筆算起，她為兩個因國家仲裁受處分的企業抱不平，受處分的原因是它們找到計劃以外的原料，并且生產了超過計劃的產品。

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有一批人在「經濟報」上發表文章責難伊莉英娜。三月十二日，聶姆欽諾夫院士（他是一個李柏曼擁護者）在「文學報」上發表一篇文章答復這些人，他在這篇文章裏揭發現行計劃工作的缺點，并且發揮現行企業物質——技術供應制度有加以改革的意見。聶姆欽諾夫指出，蘇俄限制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職權，是不正確的，中央將全部物質——技術供應權集中在自己的手裏，於是就扼殺了地方上的主動性。聶姆欽諾夫所以要對此大發議論，是因為三月七日在「經濟報」上發表文章的作者們，是五個高級經濟機關的代表，他們認為國家的仲裁沒有錯，兩個企業的行爲是表現地方主義的思想，并且大聲疾呼要爲計劃的紀律而鬥爭，并且處分其違反者。還有一點，「經濟報」所以要趕緊起而反對伊莉英娜，是因為它以前曾攻擊過這兩個企業，指它們違反計劃紀律，因此在「經濟報」看來，伊莉英娜的隨筆，好像是在反對它的立場。此項爭論，假使沒有聶姆欽諾夫插足其間的話，可能就告一結束了，不料這位科學——經濟學家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二日的「文

學報」上發表一篇文章——「有問題！」，與伊莉英娜站在一邊。聶姆欽諾夫這篇文章，似乎是爲蘇俄的社會輿論沒有滿足一九六二年討論李柏曼建議的總結而表示憤慨。他在答復伊莉英娜的攻擊者時指出，蘇俄應該使地方上有更多的權和主動性。

在「文學報」發表聶姆欽諾夫的文章以後，一九六四年三月出版的「共產黨人」第五期上也發表這位作者題爲「社會主義的業務經營和生產的計劃工作」一文，他將以前一切關於計劃工作問題所發揮過的意見蒐集到一起，將它總結爲一個嚴整的最後的概念。非常突出的是，環繞着聶姆欽諾夫這篇文章的討論，并未在「共產黨人」這個刊物上成立，「共產黨人」一直緘默了七個月以後，才在十月份第十五期上刊出讀者對聶姆欽諾夫答復的特輯。由此可見，「共產黨人」有爲數至夥的讀者來論，未投到這個論戰之中，也許是因為無權的關係。正因如此，這個刊物在發表七個月以來所收到的讀者對聶姆欽諾夫文章的來論特輯以後，并未請讀者繼續發揮，祇發表過蘇哈廖夫斯基本一篇文章，題目是「企業的經濟刺激」。

蘇哈廖夫斯基本文章同聶姆欽諾夫那篇一樣，也是被「共產黨人」雜誌放在「經濟理論與實踐」欄內發表的。這是表示蘇哈廖夫斯基本是一個新的論戰開始者，而聶姆欽諾夫的文章彷彿已不能使俄共中央得到滿足。更深入一點看，顯然關於計劃工作問題，將不根據誰在論戰中得到勝利去解決，而要根據俄共中央的路線。俄共中央拚命用人力將這條路線偽裝起來，最突出的是，儘管俄共中央機關刊物「共產黨人」在去年三月份第五期上發表聶姆欽諾夫的文章，可是它的另一機關刊物「經濟報」却照舊繼續攻擊聶姆欽諾夫，它在去年五月九日刊出中央各機關對聶姆欽諾夫所提問題的意見特輯，就是一例，這些機關是：蘇俄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仲裁委員會，蘇俄國民經濟委員會，俄羅斯聯邦國民經濟委員會和國家計劃委員會。——它們都支持「經濟報」的立場。聶姆欽諾夫爲了答復這些機關，又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三日出版的「文學報」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論一個問題」，而「經濟報」在六月廿七日以另一次個別人土意見特輯的形式作爲答復，標題是「補給還是買賣？」。其實這是一篇有關學術爭論的報導，這個爭論發生在莫斯科普利

漢諾夫國民經濟研究所。在這篇報導裏，第一段是聶姆欽諾夫的講話，其餘就是十個反對聶姆欽諾夫的人和一個擁護他的人的意見。截至目前為止，由「文學報」和「經濟報」所展開的論戰，尚未得到結論，從這裏也就證明，李柏曼的思想，既未獲致俄共中央最後的認可，也未得到官方科學機關的全力支持，顯然，此項思想仍須向蘇俄理論的和經濟實踐的上層衝擊。

一、論戰的焦點——指標問題

上面所說的「文學報」與「經濟報」的論戰，當然討論的問題和範圍並不限於伊莉英娜那篇隨筆所談的兩個企業受處分的問題，那不過是一個楔子而已。

在討論的過程中，經濟學家之間所談的是兩個原則上不同的觀點：一部份人提出建議，將一個企業的盈利率（即利潤率）作為主要指標，也就是以市場作為計劃工作的基礎；另一部份人站在反對市場的觀點上，他們同意現行計劃工作制度以「總產量」為主要指標，將生產的畫面弄得非常難看，但是主張運用其他的指標，也不擴大市場的關係。與反對市場指標有關的是：積累的標準，勞動時間一個單位中的費力程度，總流轉額，最後是加工的標準價值（簡稱NSO）等指標。

急進派——李柏曼及其擁護者

李柏曼建議以利潤作為計劃工作的主要指標。他作這篇文章的理由，是俄共新綱領要求建立一個計劃工作和評價各企業工作的制度，以便它們對於最高的計劃任務、採用新技術和改進產品的品質，即在生產的最大效果方面感到有切身的關係。

李柏曼建議的革命意義在於用盈利率（亦即利潤率）的標準評價企業的業務活動。他建議將利潤作為整個的尺度，他說：「原則在於：第一、盈利率愈高，鼓勵愈大……；第二、企業獲致的鼓勵，是在實際參加建立收入的基礎上，計劃的盈利率愈高，對於它們的鼓勵愈大，也就是說，再去擬訂壓低的計劃，就對它們不利了……。」他說：「企業為了本身的利益，將提高輪班制和現有設備

的負荷，停止對於過剩無用的投資和機床的要求，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儲備，因為過剩無用的資材在新辦法之下將使它受到嚴重的損失，即減少鼓勵的範圍；而各企業爭取壓低計劃的風氣將急轉直下的衰落下去，因為這樣的計劃不能為企業謀致高度的盈利率之故。」

李柏曼相信，在新辦法之下，各企業將自動的趨向於最大限度降低產品的成本，發揚節約精神，不再人為的提高材料、燃料、工具、動力消耗的標準。他說：「最後，最重要的一點是，各企業將趨向於最大限度提高勞動生產率，停止要求增加勞動力，並且將過剩的勞動力動用起來。」

李柏曼堅信他所建議的辦法，將廢除集中計劃領導制——現行的計劃工作制度——對於企業所作的瑣瑣碎碎的監護。不用經濟上的措施，而用一些行政上的措施，這樣會影響生產，因為清清楚楚知道有些什麼潛力和能够發掘潛力的，是企業本身，而不是越俎代庖的上級。

李柏曼的擁護者N·安東諾夫（烏里揚諾夫斯克國民經濟委員會計劃經濟處長）認為，實現李柏曼思想的辦法是：各企業和各國民經濟委員會的領導人、經濟專家和會計人員必須尋求這樣一個計劃工作和評價企業工作的原則，即在開支不大、生產很多及在增加利潤率方面表示關心。安東諾夫對於李柏曼的建議補充說：「利潤是一個主要的指標，一個集體的全部工作都將集中在它的周圍，但是，這個指標應當視為根本的，不應視為因產量和價值所派生的。在這個指標下，各企業領導人將停止爭取輕鬆的計劃，而將自己的力量用到利潤計劃之上。到了那個時候，則所爭取的，將不是小小的一個計劃，而是一個大大的計劃了；所爭取的將是節約原料、材料、貨幣資金的消耗；各企業將自己去尋求追加的任務，而不是將任務推出去；製造廠和工廠將很快的裁減工作人員的人數，將曠工的和他們破壞勞動紀律的人開除，停止規定時間以外的工作，消滅停歇，變賣因供應部份的錯誤所造成的材料阻塞。」安東諾夫還認為，在新的計劃工作方法之下，那些所謂「因計劃而虧本的企業」在一個短短的期間要變為盈利的企業。

另一個擁護李柏曼的經濟學家，就是一九六四年三月在「共產

人——第五期上發表文章的華西利·聶姆欽諾夫，他建議徹底改變蘇俄經濟計劃工作的制度。一般認為，這篇文章的建議，是一九六二——一九六四年期間蘇俄經濟學家之間關於計劃工作的討論中，向前邁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蘇俄國家勞動和工資問題委員會副主席蘇哈廖夫斯基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四日「經濟報」上發表有關八〇個企業實驗的文章，其中關於企業工作人員獎金的思想，是採自李柏曼的，但并未將利潤列為主要指標。

特拉伯茲尼科夫院士，與李柏曼、聶姆欽諾夫站在一邊，也尖刻的批評現行的經濟計劃制度，並且要求進一步的改造。特拉伯茲尼科夫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七日的「真理報」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贊成溫和的企業管理」。這篇文章刊出以後，有八位作者提出意見，其中包括李柏曼本人，他們都支持特拉伯茲尼科夫的建議——將利潤作為主要的計劃指標。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七日出版的「真理報」，發表費多連科一篇文章，題目是「重要的經濟任務」，論必須用新的取代舊的管理方式和計劃工作方式。費多連科這篇文章是站在多年以來一貫爭取在經濟中採用數學家的方法上，以便建立一個統一的最適宜的管理制度和計劃工作制度的。據這位作者的意見，要建立這樣的制度，祇有在廣泛採用經濟——數學方法和電子計算機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這一個看法，與晚近一般作者在「真理報」和其他中央級報刊上要求在經濟學、數學、電子計算機和電子計算技術成就的基礎上使國民經濟計劃工作和管理合理化不謀而同。不過，這位作者承認，蘇俄當前在經濟電子計算機和經濟——數學方法方面的水準，同它當前面臨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經濟競賽的計劃任務相比，還差得很遠，缺點還很多。費多連科院士也歡迎將工業的管理過渡到「經濟刺激」方面，這是說，在電子計算機能制訂出最適宜的計劃以前，計劃的正確基礎應該建立在盈利率的原則上。所以費多連科院士雖然不能說是李柏曼的嫡系，起碼是不反對李柏曼的一個經濟學人。

保守派——費多羅維奇和加托夫斯基

李柏曼建議與蘇俄計劃工作改制

有始有終反對李柏曼和一貫擁護舊制度的人，是M·費多羅維奇，他認為將「降低成本」的指標換為「利潤」指標，實質上問題改變的并不多。費多羅維奇說：「在我國的條件下，利潤基本上是價格與產品成本之間的差額。價格，是國家規定的，在規定價格時不但要顧到生產的費用，並且還要顧到其他非常複雜的因素。即使是產品成本，也並不反應一個企業集體工作的質量，因為它的基礎是建立在依國定價格買來的原料和材料上的。我們絕不認為，為了評價一個企業生產——經濟活動的質量實行利潤指標是沒有意義的，不過規定產品價格以及它的計劃品目，是一個企業集體職權以外的事。」

在俄共中央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全會之前，「真理報」曾主動的發起一項關於經濟計劃工作問題的討論，其中中心問題即李柏曼的建議——以利潤作為計劃工作的主要指標。十一月全會將這個問題交與經濟核算與生產物質刺激學術會議，由該會議總結關於此項問題的討論，并提出建議，以便完善計劃工作及工業企業工作的刺激。這個會議會切實從事此項工作，它所作的總結曾經一九六四年二月出版的「經濟問題」月刊第二期予以發表。在這個會議開會擔任此項問題的報告人，是著名的教條主義者和反李柏曼建議者——L·加托夫斯基。據加某發表，該會議和其他一些與之協調的研究所蒐集了許許多多材料，譬如，曾分析過大討論時期投到「真理報」未及發表的一千多篇文章和短評。這個會議反對兩大極端：一個極端是低估利潤的重要作用；另一個極端將利潤變為各企業工作上某種了不起的自動調節器，換句話說，推翻李柏曼建議的精髓。在不維護舊有的已經破產的計劃工作制度的原則下，這個會議由加托夫斯基出面採取典型的折中立場，原則上由每一方面採取某些建議。因為這個總結的關係，會依個別趨向擬定一個措施體系，其中包括有關於實現創造和刺激新技術措施的制度，國家勞動和工資問題委員會所準備的新的獎金條例草案等等。

中間派——塔拜耶夫

李柏曼等所提的利潤指標，其有力的反對者不是費多羅維奇和

加托夫斯基所維護的已告破產的現行計劃工作指標——「總產量」，而是正在鞏固自治共和國進行實驗的「NSO」指標，它既反對「總產量」的指標，也不贊成利潤指標，它採取中間的立場，頗受俄共中央的重視。

這一派的主要人物為塔拜耶夫（俄共鞏固自治共和國省黨委第一書記），他肯定的總結鞏固自治共和國的工業實驗「NSO」的指標，完全證明是正確的。據他指出，此項指標的實質在於，計劃工作僅祇顧到加工所消耗的勞動價值，而勞動的消耗則以科學上決定的標準規定之。

塔拜耶夫斷言，「NSO」這個指標能消滅按「總產量」指標所發生的一切缺點，也就是說，產品的品目對這個指標不起實質的作用，其中包括過去交易的勞動及利潤，但這些因素在按「總產量」指標作計劃的情況下，就把一個企業活動的真實範圍弄得不成樣子。其次，鞏固自治共和國採用「NSO」的指標，使未完成的生產大為減少。最後，依照「NSO」的指標作計劃，能為急劇減少領導範圍內的人員創設條件。

據說，過渡到「NSO」指標以後，生產速度大為加快，一九六三年上半年，鞏固自治共和國的產量，與上年同時期比較，增加了一二·九%，計劃上規定的是九·八%，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七·一%，計劃規定的為四·七%。中伏爾加國民經濟委員會將在鞏固、巴什吉爾和古比雪夫省各企業實行「NSO」的計劃工作指標。

不過，「NSO」指標的實驗，在消滅「總產量」指標的缺點時，也創造了一些本身上的缺點；關於這一方面，塔拜耶夫并不否認。譬如：一九六三年八月十日出版的第三期「經濟報」報導說，某些企業的成果使其物質與勞動消耗得不到報償，如果計劃工作要依照「NSO」勞動消耗的標準做的話，則每一個為了快一點完成計劃的企業，都將因誇大勞動消耗而感痛苦，因為它們將真實的隱藏了起來，要用被壓得緊緊的標準去超額完成計劃。一九六三年八月三日「經濟報」在「事務俱樂部」中指出，這個和那個廠，可以用不同的消耗製造同樣的製品。並且指出，「NSO」的指標需要幾千個和幾萬個科學上的標準，這是一個相應的科學研究所不

能很快就做得了的一件事。

由此可見，「NSO」這個指標尚未證明它是生活上所需要的，鞏固自治共和國的實驗也并未提出蘇俄全部工業很快就過渡到按「NSO」指標從事計劃工作的根據。

到目前為止，「NSO」指標對於蘇俄經濟惟一的貢獻，就是它也持反對「總產量」指標的立場。塔拜耶夫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消息報」上發表「計劃的進步指標」那篇文章時，對於「NSO」的實驗所作的總結說：「國內工業方面直到現在仍舊用「總產量」作為主要的具有決定性的指標，這祇有死硬派的教條主義者才擁護它。」他歷數「總產量」指標的缺點說：第一、破壞產品品目的計劃任務；第二、依「總產量」指標所作的計劃，要將生產弄得非驢非馬；第三、依「總產量」指標進行計劃工作，要使未完成的生產大為增長；第四、依「總產量」指標進行的計劃工作，需要有一大批機關去消滅此項計劃工作的缺點。

一、黨的態度

在一九六二年俄共中央十一月全會上，李柏曼建議的「利潤」指標，被巧妙的規避開了。全會曾經建議，就各不同的指標從事實驗，表面上好像李柏曼的建議也在實驗之列，其實對此看不出有什麼舉措。在其他一些建議中，獲得支持的，祇有「NSO」，因為這個計劃指標是典型的反對市場的，它早已受到黨務領導方面的注意，而且廣泛的在從事實驗，特別是鞏固自治共和國的工業，早在一九六二年就在計劃工作中用「NSO」的指標了。

在黑魯曉夫時代，反對摧毀現行計劃工作制度最力者，是「經濟報」，它從一九六二年開始論戰時就站在教條主義的立場上。贊成「經濟報」之立場的，在俄共中央之間一定大有人在。

俄共中央對於計劃工作制度問題，暗中有派別之分，這是不容否認的，我們從兩個俄共中央刊物為了一個聶姆欽諾夫展開論戰這一點上，就可以舉一反三了。

問題是俄共中央之內反對廢除現行計劃工作制度的佔優勢？還是贊成廢除的佔優勢？這一點，我們從三個俄共中央報刊——「真理

報「共產黨人」、「經濟報」——來看，其中支持李柏曼、聶姆欽諾夫、特拉伯茲尼科夫的佔其二，這是反映俄共中央之內主張改造的佔了多數。

肆 結論

蘇俄的經濟若是仍在現行的計劃工作制度上戀棧，不作改造之圖，大勢顯示已屬不可能：不僅輕工業裏面儲存着數以十億計的誰都不要的製成品，重工業（生產資料的生產）方面也是一樣。這是說，依靠誰都不需要的品目完成和超額完成計劃，使廢品、劣質品和企業對國家的負債作直線的上升，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助長經濟危機的導因，也是舊式計劃工作制度的理論家們提不出具體處方的一種絕症。

俄共中央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全會採取將各派主張一律付之實驗的辦法，這就是每一個患者得病亂投醫的一種當然發展；後來，李柏曼的建議自一九六四年夏開始在輕工業中加以實驗，兩個成衣企業被准許不根據上級的指令擬訂計劃，根據各商店達成協議的合同擬訂，更由於此項實驗在僅僅四個月中間就有了良好的成績表現，所以蘇俄國民經濟委員會開會決定，再以三十一%的縫紉業、二十七%的紡織業、三三%的製鞋業、一〇%的製革業投入實驗，這一點雖然是顯示俄共中央（俄共新政權）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但是大刀闊斧改革的決心仍嫌不夠。

有一個問題是值得研究的，即黑魯曉夫對於現行的計劃工作制度是不是比他的後任較為急進？答復這一問題，不能祇看一面——黑魯曉夫從一九五七年就主動的促進計劃工作的改革，去年夏又決定加強實驗李柏曼的建議，也要顧到另一面，終他第一書記和部長會議主席之任，沒有使這個問題得到最後的結論，一味走中間路線（譬如他一方面強調計劃工作的集中領導原則，另一方面重視地方分權的民主原則），這種態度，雖然不能說是保守的，也不是革命的，而是曖昧的。

還有一個問題，三大主張廢除現行計劃工作制的學者——李柏曼、聶姆欽諾夫、特拉伯茲尼科夫，他們是不是完全一樣毫無歧異

李柏曼建議與蘇俄計劃工作改制

之處？我們將每一階段的論戰通盤研究以後，發現他們中間雖然最後落於一點，但仍有其不盡相同之處：李柏曼在要求方面是一個非常小心的人，他仍舊相信他的建議——主張將利潤作為主要指標和更急進的實行以完成利潤計劃為基礎的獎金制度——不會使黨務機關現行的對生產的監護發生動搖，聶姆欽諾夫主張擴大商品——貨幣關係，用計劃——定貨制取代計劃——任務制，用生產資料買賣的方式取代補給的方式；特拉伯茲尼科夫比他們兩人更進一步，譬如：李柏曼為了避免黨務機關的批判和指責，曾在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日的「真理報」上寫道，利潤在蘇俄不會變為資本，因為任何人都不能購置私有的生產資料；特拉伯茲尼科夫則不理會規定的教條，堅決主張蘇俄的經濟用「資本」來表示基金和利潤，他說：「……：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資本是收入的泉源，而利息是資本家的利潤，我國由資本得到的利息，是國家的收入（口袋祇有一個——國家的口袋）。」

他們三人的建議，歸納起來是這樣的：對於經濟，應當以核算制取代命令式和強制的影響；各企業應當爭取增加自己任務的計劃，而不是像現在爭取減少，為達到此目的，必須將利潤作為計劃的主要指標，一個企業獲利愈多，表示它的工作愈好，從而它的工作人員所得的獎金愈多；一個企業的計劃，應當是計劃——契約（定貨）制的，而不是現行的計劃——任務制的，企業所需要的生產物資和技術，應當以國營商店售賣的方式取代由中央集中分配補給的方式。

一般認為李柏曼、聶姆欽諾夫和特拉伯茲尼科夫革命性的改革經濟計劃制度的主張，把市場的因素拉進蘇俄經濟裏面，使它開始向資本主義轉變，顯然大有認為他們三人的主張富有反黨反共的意味，這未免過火一點。我們讀遍李柏曼、聶姆欽諾夫和特拉伯茲尼科夫的文章，從未發現有反對國家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的詞句與意向，他們既然仍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則任何改革的主張，祇能說是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却不能誤認蘇俄要放棄共產主義改革採資本主義。在敵我的鬥爭中，主要是站穩自己的立場和看清對方的立場，在對方用種種方法鞏固其原來立場時，我們自己的發生錯覺，導致失敗，這種失敗是我們自己製造的，也正是敵人求之不得的。

俄共組織現況分析

關素質

據本年五月份第十號俄共中央機關雜誌「黨的生活」公佈俄共中央有關俄共第二十二屆代表大會後（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黨的組織之資料，頗有參考價值。茲就俄共黨員人數、入黨成份、黨員之分佈、基層黨組織、黨員民族成份、黨員職業成份、黨員教育成份、婦女黨員人數、黨員之黨齡與年齡、開除黨籍情況、黨機關現況等項目列表加以說明，并根據這五年來俄共黨組織的發展與變化，可看出俄共第廿三屆代表大會之動向。

一 俄共黨員人數

俄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後，俄共黨員人數增加二百零四萬二千一百六十六人，茲列表如下：

年	份	黨	員	候補黨員	俄共黨員總數
一九六一年	一月一日	八、四七三、三六六	八〇三、四三〇	九、二七五、八二六	
一九六一年	十月一日	八、八七二、五六	八四三、四八九	九、七六、〇〇五	
(俄共第廿二屆代表大會)					
一九六二年	一月一日	九、〇五一、九五四	八三九、二四	九、八九、〇六六	
一九六三年	一月一日	九、五八一、四九	八〇六、〇四七	一〇、三六七、二九六	
一九六四年	一月一日	一〇、〇二二、九六	八三九、四三三	一〇、八六二、三九九	
一九六五年	一月一日	一〇、八二一、四三三	九四七、七六	一二、七六九、一九	

從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十四個加盟共和國共黨人數變化如下：

十四共和國共黨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人數	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人數
烏克蘭共黨	一、三七〇	一、八二九
白俄羅斯共黨	二、二二五	三、一九九
烏茲別克共黨	二、二二五	三、一九九
哈薩克共黨	三、四一五	四、二七九
格魯吉亞共黨	二、一五九	三、八七九
阿塞爾拜疆共黨	一、二六六	一、九八五
立陶宛共黨	一、〇五五	一、三三九
莫爾達維亞共黨	五、九〇八	八、五七九
拉脫維亞共黨	七、二九〇	八、八三三
吉爾吉斯共黨	六、五二五	九、四七五
塔吉克共黨	五、二二五	八、七四一
亞美尼亞共黨	八、〇〇八	九、七四一
土庫曼共黨	四、五八四	六、二〇四
愛沙尼亞共黨	三、七七七	五、〇〇四

俄共第二十二屆代表大會共有黨員八、八七二、五一六名，每二千黨員產生一個有表決權之代表，共選出四千四百零八名代表，候補黨員八四三、四八九名，每二千候補黨員產生一個有發言權的代表，共選出四零五名代表。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共增加黨員（包括候補黨員）二百零四萬二千一百六十六名，其中黨員增加一、九三八、九二七名，以每二千黨員產生一代表，應增選九六九名有表決權之代表，候補黨員增加一〇三、二三七名，應增選五十一名有發言權之代表，本年倘能召開第廿三屆代表大會，其代表人數將比上屆代表大會增加一千零二十名以上。

二 入黨成份

從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四年五年來入黨人數如下：

年份	加入為候補黨員	加入為正式黨員
一九六〇年	六七二、八七九	五四五、一五五
一九六一年	七一〇、九八一	六五八、八〇六
一九六二年	六六〇、二九九	七〇五、三〇〇
一九六三年	七七一、四三九	七四〇、八二九
一九六四年	八七九、四二八	七四〇、八二九

一九六四年加入為候補黨員八十七萬九千四百二十八人，其成份如下：（百分比）

工人	集體農莊莊員
四五·三	一五·一
二七·七	一〇·九
其餘	一·〇

上表所列工人候補黨員佔百分之四五點三，集體農莊員候補黨員佔百分之五點一，工人及集體農莊員合計佔百分之六〇點四。

一九六四年工人加入為候補黨員者其成份如下：

工業企業工人佔百分之五二·五，建築工人佔百分之九·九，運輸及交通工人佔百分之三，國營農場工人佔百分之一六·一，其他經濟部門之工人佔百分之八·五。

一九六四年集體農莊莊員加入為候補黨員者為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三人，以拖拉機手、聯合機手、機械師佔多數。

工程與技術工作人員、農業專家、動物飼養專家、醫生、教師、經濟學家，以及其他國民經濟專家入黨者繼續增加。一九六四年工程技術人員及各科學部門之專家加入候補黨員者共計四萬六千人。

共青團團員之入黨，為俄共新黨員重要來源之一，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共青團團員加入為候補黨員者共計

俄共組織現況分析

一百二十五萬四千人，幾乎是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入黨者半數以上。茲列舉最近幾年共青團團員加入為候補黨員者人數如下：

一九六二年	三五五、一七四
一九六三年	三八〇、四二八
一九六四年	四一八、〇五三

近幾年來加入為候補黨員成份以工人及集體農莊莊員較多，佔百分之六〇點四，工人以工業企業工人為最多，佔全工人入黨百分之五二點五，集體農莊莊員入黨者以拖拉機手、聯合機手及機械師為最多。共青團團員加入為候補黨員者一百二十五萬四千人，佔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入黨者半數以上（五年來入黨總數為二百零四萬二千一百六十六名）

三 黨員之分佈

俄共第二十二屆代表大會後，為執行黨的路線，黨員直接參加生產者增加，現列舉黨員分佈於國民經濟中各部門工作者如下表：

所有共產黨員在國民經濟中工作者：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五年	
	七月一日	一月一日	七月一日	一月一日
(一) 在物質生產部門工作者：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① 在工業與建築業者	七一·四	七二·四	三三·五	三五·九
② 在運輸與交通業者	九·二	九·二	二·三	二·六
③ 在農業中	二·三	二·三	五·四	四·七
④ 在貿易、食品、收購、物質技術供應與銷售業者	二·八	二·八	一五·六	一六·五
(二) 在非生產部門工作者：	二·八	二·八	二·七	二·七
① 在科學、教育、衛生、文化部門	一五·六	一五·六	一〇·八	九·一
② 在國家機關、經濟管理、黨機關、社會組織	二·二	二·二	九·一	九·一
③ 在其他部門	二·二	二·二	二·〇	二·〇

從上表看來，黨員參加物質生產者逐年增加，一九六四年增加

四十八萬人，最近三年來增加一百餘萬人。

最近三年來在工業中之黨員人數增加四分之一，在機床製造業，儀器製造業、電工、無線電工業等工業部門增加百分之四二到五五。近年來俄共重視化學工業之發展，一九五八年五月俄共中央全會之後，化學工業中之黨員增加到二倍半以上。

根據俄共中央的統計，工業企業、運輸、建築、國營農場、黨組織中工人黨員人數增加如下表：(百分比)

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	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
工業企業	五三·二
運輸	六〇·七
建築	五一·六
國營農場	七〇·三
	五三·五
	六二·六
	五二·五
	七〇·九

在農村方面，近年來黨的力量之分佈亦起了變化，黨員從事農業者人數增加如下表：

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	從事農業黨員總人數	在國營農場工作	在集體農莊工作
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	一、八〇、三〇一	五七八、五二六	一、二五〇、四四五
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	一、九四〇、八四四	六三三、六八〇	一、二九二、五五九
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	二、〇五、五七三	六六八、四〇〇	一、三九、九四五
	二、二四、二五五	七三三、七二〇	一、二六五、〇七七

集體農莊黨員基本力量集中於農業部門之生產，茲引證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集體農莊黨員之分佈如下：

所有集體農莊黨員	一〇〇
在田間、菜圃、園藝中工作者	三〇·七
在牧場中工作者	一七·九
拖拉機手、聯合機手、機械師	二五·一
農業專家、動物飼養師、及其他經濟專家	五·三
生產隊隊長及其他工作者	三·七

國營農場黨的組織決定大多數黨員均須參加生產，本年三月俄共中央決議稱，為保證技術較高的機械師、工程師、技術專家等幹部集中於農村，為發展農業生產條件之一，現在已有五十二萬黨員在國營農場及集體農莊中擔任拖拉機手、聯合機手，及農業機械師，比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增加十五萬八千人。

在科學、教育、衛生、文化部門工作之黨員增加，最近三年增加到三十萬七千人。同時在管理機關中工作之黨員減少。

俄共黨員之分佈，向直接參加生產、管理工業生產，科學與技術部門這一方面走，是俄共進步的一面，表示俄共組織在轉變中

四 基層黨組織

黨的基層組織是俄共黨的基礎，由工廠、國營農場、企業、集體農莊、機關、及科學機關之黨員所組成，茲列舉五年來基層黨組織逐年增加數字如下：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	二九四、八七三
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	二九八、八四九
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	三〇五、四〇七
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	三〇五、六三一
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	三一、九〇七

經濟與文化部門基層黨組織在數量上已有一些改變，如下表：

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	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
基層黨組織數量	二九八、八四九
俄共黨組織數量百分比	一〇〇
① 工業企業、運輸、交通、建築	七六、〇〇二
② 國營農場	九、三五一
③ 集體農莊	四一、二九
④ 商業企業社會食品	二二、六三三
基層黨組織數量	三三一、九〇七
俄共黨組織數量百分比	一〇〇
① 工業企業、運輸、交通、建築	七七、八三六
② 國營農場	一一、六一
③ 集體農莊	三八、五五一
④ 商業企業社會食品	一三、五三三

⑤ 教育、學術、醫療、文化機關	五八、四六	一九六	六九〇六六	三三·一
⑥ 機關、組織、經濟（從中央到區級）	五三、〇五	一七七	五、二六七	二六·一
⑦ 其他	四八、二〇〇	一六一	五、三三一	二六·五

上表顯示國營農場基層黨組織增加，一九六二年為九、三五一（佔百分之三·一），迄一九六五年增到一一、六〇一個（佔百分之三·七），一部份較差的集體農莊，自一九六二年改組為國營農場，因此集體農莊基層黨的組織一九六二年有四一、一一九（佔百分之三·八）個，迄一九六五年即減低到三八、二五一（佔百分之二·三）。

教育、學術、醫療、文化機關基層黨組織增加，一九六二年為五八、四八八個（佔百分之一九·六），迄一九六五年增到六九、〇八六（佔百分之二二·一）個。

俄共第二十二屆大會以後，設立「黨委員會」之基層黨組織工作加強，車間黨組織及黨的小組之人數增多。各基層黨組織百分比如下：

俄共黨員及候補黨員基層組織總人數	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	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
十五人以下者	一〇〇	一〇〇
十五至四十九人	四二·五	三九·九
五十人至一百人	四四·一	四三·五
一百人以上者	八·五	一〇·五
	四·九	六·一

設立「黨委員會」之基層黨組織之數量，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為一三、九七五個，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增到二〇、一二八個。現在在工業企業中基層黨組織黨委員會共有三、〇四二個，建築組織中共有五個，在國營農場中有三、八二七個，在集體農莊中有八、六三〇個，此外尚有四二四個大企業及大機關中之「特別黨委員會」，其黨員人數超過一千人以上。茲列舉五年來車間黨組織

俄共組織現況分析

及黨的小組發展數字如下：

年份	車間黨組織	黨的小組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	一七三、九六一	一六四、九三一
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	一九八、二五二	一八四、三三〇
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	二一八、五四四	二〇八、六三五
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	二四一、二〇六	二六八、四九三
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	二六七、四八一	三二九、六一三

近年來設立「黨委員會」之基層黨組織訓練大批新黨員，一九六五年初已有二百萬零七千黨員被選為黨委員會、車間黨組織及基層黨組織支部之書記、副書記及黨小組書記。

五 俄共黨員民族成份

蘇俄居民中有一百多個民族，一九六四年加入俄共為候補黨員之民族成份：阿賽爾拜疆佔百分之七四點四，亞美尼亞佔百分之九一點八，白俄羅斯佔百分之七八點六，格魯吉亞佔百分之七八點二，立陶宛佔百分之七六點一，塔吉克佔百分之六八點五，烏茲別克佔百分之六〇點三，烏克蘭佔百分之七一一點七，愛沙尼亞佔百分之六一等等。

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俄共黨員及候補黨員民族成份如下表：（以千為單位）

- ① 俄羅斯人 七三三五·二
 - ② 烏克蘭人 一八一三·四
 - ③ 白俄羅斯人 三八六·〇
 - ④ 烏茲別克人 一九三·六
 - ⑤ 哈薩克人 一八一·三
 - ⑥ 格魯吉亞人 一九四·三
 - ⑦ 阿賽爾拜疆人 一四一·九
 - ⑧ 立陶宛人 六一·五
 - ⑨ 莫爾達維亞人 四〇·三
 - ⑩ 拉脫維亞人 四四·三
 - ⑪ 吉爾吉斯人 三五·〇
 - ⑫ 塔吉克人 四一·九
 - ⑬ 亞美尼亞人 一八七·九
 - ⑭ 土庫曼人 三二·四
 - ⑮ 愛沙尼亞人 三三·九
 - ⑯ 其他民族 一〇三五·三
- 總計各民族共產黨員為一七五八·二人。

六 俄共黨員職業成份

俄共第二十二屆代表大會後，共黨在蘇俄社會中之地位已經改變，茲列舉黨員職業成份比例如下：

所有共產黨員 農民(集體農莊莊員) 職員及其他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四年
	一〇〇〇 一三五〇 一七三〇 四七·七	一〇〇〇 一三七〇 一六·五 四六·二

目前俄共黨員中工人及集體農莊莊員佔大多數，即佔百分之五三點八。最近三年來黨內工人數量增加九十三萬一千八百人，集體農莊莊員增加二十二萬五千七百人，合計增加一百十五萬七千五百人。

黨內職員中屬於腦力勞動工作人員人數增加，各種科學部門專家，如工程師、技術專家、農業專家、動物飼養專家、經濟學家、教師、醫師，以及其他國民等經濟專家黨員之百分比如下：

各種職員之黨員	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	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
	①各級黨組織領導者、機關人員、企業人員、建築人員、國營農場及其組織中之隊長、分隊長 ②工程技術人員，農業專家 ③科學工作人員、教育工作者、衛生人員、文學家、藝術家 ④商業企業工作人員、社會食品人員、供應及銷售人員 ⑤黨政監察人員，統計人員，文牘人員 ⑥其他職員	一〇〇〇 一〇·一 二八·〇 二一·六 四·九 一一·八 二三·五

目前俄共黨員中工人及集體農莊莊員佔多數，即佔全體黨員百分之五三點八，俄共第廿三屆代表大會工人及集體農莊莊員之代表將佔多數，工程技術人員及農業專家之代表將比上屆增加。

七 黨員教育程度

近幾年俄共黨員及候補黨員之教育程度均提高，列表如下：

所有黨員及候補黨員會受教育者	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		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	
	絕對數字	百分比	絕對數字	百分比
受完高等教育	九、八九一、〇六八	一〇〇	二、七五八、二六九	一〇〇
受完中等教育	一、三四九、五五五	一三·七	一、七六三、二六二	一五·〇
未受完中等教育	二、八二二、〇六一	二九	三〇一、二五五	二·六
受完中等教育	二、六九三、四五七	二七·二	三、五四二、〇〇五	三〇·一
未受完中等教育	二、八二二、〇八一	二九·四	三、二七七、〇〇四	二七·九
受初等教育	二、七五四、三〇七	二七·八	二、八七四、七三三	二四·四

近三年來俄共黨員會受高等專科及中等專科教育者增加八十四萬七千九百人，現在黨員專家中工程技術專家及農業專家幾乎佔黨員專家半數以上，茲列舉五年來黨員中會受高等及中等專科教育者如下：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黨員專家為二百九十五萬一千二百三十人，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增為三百二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三人，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增到三百四十五萬四千八百八十人，一九六四年一月一日增到三百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三十三人，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增到四百零六萬三千五百三十人。

俄共黨員中科學工作人員增加，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黨員及候補黨員有候補博士資格者六萬三千一百二十人，有博士資格者六千七百八十三人，比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增加一萬三千人。

八 女黨員人數

